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6月30日第155期

本期目录

【重庆文革专辑4】

生逢乱世

蒋 蓉 革命洪流中的小水滴

杨革非 话说“新三届”中学生中的红卫兵执勤连

王牧滋 当年刻碑那桩事

口述历史

韩平藻 文革中的重庆“八一红卫兵”调查

史林一叶

庞国义 重庆市北碚区抄家物资的管理和早期退还片断

故纸堆

渔歌子录入 十一月九日重庆警备区雷副政委白副军长的重要讲话

【生逢乱世】

革命洪流中的小水滴

蒋 蓉

升初中时遭遇贯彻“阶级路线”

1952年院系调整，我父母从成都来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工作。

西师的教职员工子女从学龄前开始就会进入西师实验幼儿园接受教育，到学龄阶段依次进入西师附小和西师附中。可是到我1964年该上中学之前，贯彻“阶

级路线”已经全面铺开。升学考试前，小学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做思想工作，她说：每个同学都要认真考虑啊，特别是家庭出身非工农、非革命干部的，最好自觉点儿，不要填报西师附中。不听话非要报附中的，附中不录取，其他中学也不会录取，结果嘛，你要么去读民办中学，要么成为社会青年。到时候来后悔，就晚了哦。

老师的语气是平和的，她并没有把我这类非红家庭出身的学生当阶级异己分子，只是她说话的时候，目光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每扫一下，我的脸上都有刺刺的感觉，可能是自己心虚吧。

那时，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爷爷奶奶是地主（但还不知道我的外祖父一家除我母亲外全都在台湾和美国，外祖父时任中华民国邮政总局副局长，曾经随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并受到嘉奖，有国军少将军衔。外祖父的身份是“敌人”，而我们一家都属于“台属”和内控对象）。虽然我平时填写的家庭成分是教师，但因为地主成分的爷爷奶奶，心里是不踏实的，教师这个家庭成分对于我，就像是黑色墙面上裱糊的一层白纸，一不留神戳破了，里面的颜色便暴露无遗。

那年月，有相当一部分少年因“家庭成分不好”或是成绩不合格，接受学校教育到小学毕业就止步了，也就是老师说的成了社会青年，而社会青年是一个贬义的称谓。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是一位教学态度认真负责而且教学效果相当不错的好老师，她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够升入中学。但是贯彻“阶级路线”全面铺开以后，像我这一类非红学生报考西师附中，必定通不过“阶级路线”政审关，与其让我们因此成为不入流的民办中学学生，甚至成为社会青年，还不如趁早动员我们报考次一等的学校，一方面确保升学率，另一方面也保证我们能够接受较好的学校教育。

放学回家，我把老师的意思向父母说了，也表达了自己打算报考十三中的意愿，虽然我觉得以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能力，考上西师附中是没有问题的。父亲的反应有些激烈，他当即反对：为什么不能报附中？你们老师凭什么不让你报附中？就报附中！我急了，大声争辩：那样的话肯定什么中学也上不成，最后只能去读民办中学了。后来，父亲怎么同意了我报考十三中，记不起来了，也许是通过政治学习把贯彻阶级路线的方针政策领会透彻了，不能不同意我报考十三中吧。其实，他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只能报考十三中，在当时，这所学校是我最好的选择。

我很庆幸就读于十三中。这所学校没有歧视非工农学生的异常氛围，主要是因为学校有一位一身正气的好校长。校长叫陈洛。那时我年纪小，不知道校长的履历，后来也没刻意了解过，很遗憾。很多年后听我的班主任戴老师说，在贯彻“阶级路线”的疾风暴雨中，陈校长的指示掷地有声，他说，只要成绩好的学生，

不管啥成分，只管招进来！十三中招收了相当一部分和我一样没资格报考西师附中的学生。有陈校长这棵大树的荫护，像某些学校那种把少数非工农学生孤立起来、再施以严厉打击的怪异现象，我们学校未曾出现过。

（作者当年的“全家福”合影，后排右为作者，左为作者的哥哥，前排为作者父母与弟弟。）



报考十三中我是成竹在胸，考试以后完全没有焦虑，那个暑假我把自己放松成了脱缰的马，不读课文（没有课本）不写作业（没有作业），睁开眼睛手里捧的只是课外书籍。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那个时候能接触到的课外读物，基本上都是描写革命战争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这些书籍文革期间也成了被批判的禁书）。由于父母经历了文革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他们自身家庭出身的原因，特别重视把我们往政治正确的道路上引导。本来，学院的图书馆或母亲工作的中文系资料室可以借到各种世界名著（至少苏俄东欧各国的可以），可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山乡巨变》、《三里湾》、《草原烽火》、《香飘四季》、《林海雪原》、《三家巷》、《苦斗》……这一类的革命小说。不过，父母允许我们每周看一次电影院公开上映的电影（学院周末晚上的坝坝电影除外），包括外国电影，但香港电影却被严禁，公开上映的也不行。脱缰的马在这样的精神原野里驰骋，自然不会跑出圈定的范围。父母的刻意引导，对我们少年时代“革命英雄主义”情结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情结”在后来的文革中得到充分展现。

最初的文革印象

对于我来说，文革的到来，最初的印象就是一天老师在教室里宣布不考试了！我们一个个兴奋得像麻雀唧唧喳喳蹦蹦跳跳，晚上熄灯了，寝室里还像赶集一样热闹，同学们为不再考试欢呼雀跃，七嘴八舌探讨我们完全搞不懂的文化大革命。我们都非常幼稚地以为，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可以否定好多我们当学生的人不喜欢

的东西，比如考试，比如学外语——我最讨厌的一门功课。

其实不考试，也并非我的愿望。在老师宣布取消考试之前，已经公布了语文考试题目：写一篇作文（开卷考试）——在描写越南南方争取解放的课文里找一个段落，自己扩写成一个故事。我都构思好了，还被自己编的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不考试了，我的作文再也没法展现，成了一大憾事。只不过外语考试却是让我惶恐不安的一件事。之所以惶恐，当然是因为学得不好，而学得不好又不是没有客观的缘由。

在中学，刚开始教我们英语课的那位老师很有特点，他个子很小但干净利落，一双三角眼本来是阴险狡诈的特征，却经一副金丝眼镜妆点化作了谦和智慧。他西装革履，偏分头油光水滑，一副留洋归国的派头。英语老师有没有留过洋我不知道，但他的教学水平确实不错，学生们都在背后戏称他“英国小老头”。

“英国小老头”教我们的时间很短，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表扬过一番，那时候，我学外语劲头十足。这个“英国小老头”平时不苟言笑，暗地里却不大本分，某一天，一条本校新闻在校园里炸了锅，“英国小老头”被抓了！我们听到的罪名，是他诱奸了一名女学生。那以后，再没有专业英语老师给我们上课。

取代“英国小老头”的老师身体可能有点病，他就像柬埔寨的宾努亲王一样不住地晃脑袋和吐舌头。上课时，调皮的男同学就学他的模样做鬼脸，大喊大叫，把课堂搞得比集市还热闹，老师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我在那个热闹非凡的集市里，没有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幸好考试取消了，否则我落个不及格，在父亲那里是绝对过不了关。这件事影响如此深远，时至现在，我还时不时会梦到英语考试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装进去几个单词，然后在一阵慌乱中惊醒。

取消考试这事，连文革的一个小插曲都算不上。我们的兴奋劲还没过，工作组来了，动员学生给学校的当权派和老师写大字报。写大字报对于我们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内容是揭发批判，且直指我们身边熟悉的人，这和写作文就有天壤之别了。学校当权派除了开全校大会，平时和学生难得打个照面，没法写。写自己的老师，老师也没啥错误，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我们还不不懂，也没那个水平，写大字报确实很犯难。想来想去，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写了平生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指责老师喜欢男同学不喜欢女同学，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

在学校校园内（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看见过一次陈洛校长和其他一些人被押着排成队，手里拿着锣（或破脸盆？）边走边敲边唱：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向我专政，我就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把我砸烂砸碎。

这是我关于学校“走资派”的唯一印象，他们被关押、游校园和这样自侮，是不是和工作组有关，我还是不知道。那个时候，年纪不大，浑浑噩噩的，没有自己的脑子，也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思考和思想。

记忆中，1966年暑假前，可能是为了配合文革的开展，学校里搞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活动。那天晚餐吃忆苦饭，好像吃的野菜玉米面糊糊和黑乎乎的糠麸团子，食堂各个门口都有人把守，忆苦饭不能带出食堂，这就意味着不能不吃更不能扔掉。饭后，在同时兼做礼堂用的食堂里放了两部电影，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和革命传统教育，一部是《突破乌江》，一部是《农奴》。看电影的时候，接纳了忆苦饭的胃开始一阵一阵绞痛。

两部片子都是看过的，但《农奴》是我喜欢的电影，里面的插曲——才旦卓玛唱的那首“无字的歌”，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曲之一：

阿哥
你何须说
何须说
且听我为你唱歌
我只能唱一支无字的歌
为了我的歌
你也要在人世上生活

那时候，还没有全面铲除“情调不健康”的文艺作品，还可以听到一些字面上看不到情和爱，但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温婉柔情的歌曲，旋律本身也如泣如诉，和阶级斗争的铿锵有力不大协调。可惜胃部的疼痛让我基本无法正常观看电影，最喜欢的歌曲也没心情欣赏。看完电影，忍着胃痛回家了。

大约在暑假后，学生按时返回了学校，文革已经开始，返校不是上课，而是选赴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代表。记忆中，我们那里的第一批红卫兵，开始叫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来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据说是重庆市委插手并支持的组织，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不能参加。我们班选出的两位红卫兵代表都是工人的子女。

几个小女生茫然的大串联

代表们从北京回来不久，大串联开始了。大串联，对于没有成为代表的其他红卫兵学生，以及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没资格加入红卫兵的学生，都是一个意想

不到的喜讯。消息灵通反应敏捷的，已经动身北上了。真的可以不花钱去北京，还可以见到伟大的领袖，把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我和我哥哥，都激动得不行。少年时代，我和哥哥都更喜欢和自己的同学一起活动，因此我没缠着哥哥要跟他一起去串联。

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同学间阶级阵线还比较模糊，文革一开始，工农革干军人家庭出身的同学，都成了红卫兵，而我们这些“非红”学生虽然有着和他们一样伟大的革命理想，却只能参加“红色外围组织”，做一个团结对象。红外围叫做“毛泽东思想赤卫军”，也是重庆市官办的统一组织。我得到那块胸牌之后，倒是傻乎乎地戴了好久，那牌子让我觉得自己也是一名革命者了，很有光荣感。

由于“红卫兵”和“赤卫军”两个组织的阶级成分不同，以前还模模糊糊的阵线因此变得分明了，就像大浪淘沙，我们“非红”学生尽数被淘出来抛弃在沙滩上。大串联开始的时候，没有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邀请我们一起干革命，我们结伴出行的五个女孩，四个是西南师院子女，还有一个父母好像是什么单位的职员。

我们背着硕大的铺盖卷来到火车站。车站广场人山人海，面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队伍，我们老老实实在地排队等候领票。

倒是那个年代倡导的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机会。加入串联洪流的革命小将，吃喝拉撒睡都在火车站，遍地垃圾污物迅速增加着车站工作人员的工作量，闲极无聊的我们觉得，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学习雷锋好榜样吧，就帮着车站的员工扫地清除垃圾。这并不刻意的“助人为乐”得到了员工的真心喜爱，她们给了我们一个意外惊喜，有人悄悄告诉我们——往火车站外走几里路，有一列去北京的车停靠在那里，没什么人知道。我们抑制着内心的狂喜，背上背包悄然离开了广场的长蛇阵。到了那里果然看见有一列火车，还基本是空的，几个人上车选好座位，等着开车。

待那列火车开进重庆站台，迎面扑来的是比钱塘江潮还厉害的人潮，仅仅几分钟，车厢就被塞成了铁皮人肉馅包子。一名看样子是大学学生的北方女红卫兵，在行李架上爬来爬去，大声动员：红卫兵战友们，革命小将们，为了列车的安全，去过北京的同学，请主动下车，让其他战友去北京吧。原本坐得好好的我们，鬼使神差被挤下了座位，站在两排座位的中间，还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动弹不得。

同行的几个女生开始大哭，她们提议，我们下车算了。我把头一扭装没听见，不吱声也不动。她们的声音就变成了哀求：蒋蓉求求你，我们下去吧！泣不成声涕泪横流。下车和继续待在车上的比例成了几比一，处于绝对劣势的我还没有一个人去北京的勇气，只好放弃坚持，背起硕大的铺盖卷跟她们一起挤下了车。我的脚刚刚落地站稳，还没来得及转过身，火车就“呜”地一声长鸣，轰隆隆、轰隆隆——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北京跑了。望着咣当咣当渐渐远去的列车，

我心中充满了绝望，我预感这种机会再不会有第二次了，终于忍不住跟她们一起，怀着截然不同的心情痛哭失声。

后来，我们上了一列到贵阳的火车，想着先走出去再说。贵阳是个偏僻落后的地方，没什么人愿意去，不挤，一路上坐得舒舒服服的。我们在贵阳待了约十来天吧，记得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去大街上吃贵阳的酸辣米粉，吃完后肚子痛，蹲在大街上走不动路，太辣了。另一件是到贵阳后商量去向，三个同学在成都有亲戚，主张去成都，我那时不知道我们家也有亲戚在成都，而且我原本就一个心眼要去北京，就坚定不移地说要去北京，还有一个同学随大流。这样我又成了少数，还是只能服从多数。

那时的贵阳是个很小的城市，感觉不好玩，又没有我们向往的火热革命氛围，距离毛主席比重庆还遥远，就去了火车站等待离开的机会。因为火车时刻不确定，我们待在车站再不敢随便离开满大街找馆子买东西吃，只能在车站里买些饼干充饥。晚上也在站台地上坐着，虽然自带了铺盖，却不敢打开，怕火车突然来了收拾不及，只好坐着睡个囫囵觉。

记得有一天晚上特别冷，大家都把棉衣拿出来披在身上，双手抱膝盖，脸埋在腿上睡觉。开始，我跟几个北方来的学生瞎聊，嘻嘻哈哈地还没感觉怎么冷，一个同学就把我的棉衣要去盖在腿上。夜慢慢深了，候车的革命小将们基本都进入了睡眠状态，寂静之中寒气一点一点从皮肤往骨头里渗，我感到自己快被冻僵了，上牙和下牙开始激烈地磕碰，舌头也已经不属于自己，说起话来和喝醉酒一样口齿不清。实在忍无可忍，我把同学摇醒想要回我自己的棉衣。谁知同学睡得懵懵懂的，抬起头说了一句“你不冷”，脑袋一耷又跌回了美梦之中。我也不好意思“硬抢”自己的衣服，只好拼命把自己蜷缩成一团，竭力减少身体接触冷空气的面积，浑身打颤的我刻骨铭心地体验着“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圣诞之夜承受的那种彻骨寒冷。后来，旁边的一个外地学生看不下去了，给了我一件衣服，才勉强熬过了那个夜晚。

从贵阳到成都的火车，也不像去北京的火车那样爆棚，有没有座位不记得了，但记得车上有两个军人，还和我们一起唱“我和班长”等歌曲，很热闹。到了成都，我们被安置在地质学院，一间大教室里地上铺满了草垫，我们打开自己的铺盖卷，把油布铺在草垫上，再铺上自己带的垫棉絮和床单，就成了很舒适的“床”。饭是免费的，一日三餐自己拿碗去学院的食堂打饭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决定去串联的时候，除了去北京见伟大领袖这个目的以外，还真没有别的什么目的，也弄不清楚大串联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北京没去成，到了别的城市也不知道该干啥，就和当时所有串联的中学生一样，要么去各个大专院校抄那些我们眼里非常深刻的大字报，要么去街上排队买毛主席的像章和像片。其

余的时间，就这家饭馆进那家饭馆出，尽情享受在家里享受不到的花钱自由。出来的时候父母给了10元钱，对于我简直就是一笔巨款，还可以不受约束地乱花，那感觉真爽。

在成都串联期间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去大邑县接受阶级教育，参观“罪恶的地主庄园”。地主庄园每天涌入多少革命小将，不知道。我们参观的时候，庄园内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展览刘文彩奢华生活的地方，尤其是镶满珠宝的床（或蚊帐？）那个展厅，砌着层层叠叠的人墙，站在最前面的人眼球紧紧贴在从未见过的珠宝上，被闪瞎了也不肯退出来，凭我们的身高和体力只能望而却步。泥塑《收租院》看了，远远不及后来我们学校宣传队演出的《大型泥塑剧“收租院”》，那么具有感染力。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里的面条，8分钱一碗，超好吃。离开地主庄园那天早上，我特意买了一碗装在自己的漱口杯里，边走边吃。

那时，在学生中开始掀起了学习红军长征步行串联的热潮，我们几个也赶时髦，决定步行去大邑县。去的时候大家倒是意见统一步调一致，回程的时候其他几个女生不干了，她们要坐车。

从离开重庆起我就总是跟她们达不成共识，并且总是处于憋气的少数状态。这一次我非常强硬，表态坚决不同意坐车，晚上在接待站准备睡觉的时候，几个女孩大吵一架。我们吵架其实是声音大到了吵架的程度，嘴里并没有半个脏字，说的全都是革命道理。我大声喊，你们这些人那么娇气、那么懦弱，一点革命精神都没得，和你们在一起简直倒霉透了！我不管，反正我坚决不坐车，一个人也要走回成都。语气决绝。其实，在我那些慷慨激昂的革命大道理后面，是藏着私货的——我晕车，从北碚区到市中心不到两小时的车程，每次都呕吐得一塌糊涂。还有，虽然我嘴很硬，但真的让我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也是有心无胆。和他们吵得那么激烈，本来包含了争取盟友的意思，可我就是不说，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大义凛然的革命者。当然，我公开强调的那些理由，在那个年代那种氛围里，也冠冕堂皇得很，完全挑不出什么毛病。局面很僵，最后还是总随大流的那个女生出来打圆场，她说我们两个一起走吧。风波平息了。

吵了架的女孩子们第二天就和好了，分手的时候，还有些依依不舍。挥手告别之后，我俩背上背包勇敢地沿着公路向成都进发。因为来的时候已经走了一百余里，返程又是一百余里，从来没走过那么远的路，没多久我们就开始一瘸一拐的了。我们个子小，硕大的背包几乎把人全部遮挡了，从背后看就只能看到大半脑袋和不停移动的两条腿。沿途不止一两个司机被我们感动，把车开到我们身旁主动停下来招呼：小妹儿，上车吧。我们感动得泪水盈盈的，决心却没有动摇，我们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谢绝了司机们的好意，坚定不移地走完了我们的“长征”之路。

那时候，接待革命小将的工作真正落实到了最基层，一路上，任何一个人民公社都有政府设置的接待站，吃饭住宿全是免费的，所到之处，接待我们的人还非常热情，就像我们立下了什么显赫战功似的。在一个特别小的接待站里，我们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到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接待站的人员专门为我们做了饭，烧了洗脚水，感动不已的我们特意向他们要了一张大红纸，写了满满一纸感谢的话语。

回到成都，我们几个在地质学院接待站会面了，三天不见，搞得跟战友久别重逢似的，好一阵激动。她们有亲戚的也都去亲戚家拜访过了，我们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继续待在成都，唯一的理由就是想等等看还有没有去北京的机会。某一天，我们偶然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国务院关于暂停免费乘车串联的通知。机灵的人开始找人换票。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学校开的介绍信只须在领票的时候出示，领了票上火车则只看车票。聪明人都在钻这个空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换，又免费在祖国大好河山旅游了一大圈，使得免费乘车串联余波震荡，经久不息。老实巴交的我们属于榆木脑袋不开窍，看了通知后，只是装了一肚子的遗憾。回到接待站问了问，得到的回复和通知一样，已经开始想家的我们就领了回程票，回到重庆。

糊里糊涂亲历“一二·四”事件

我们回到重庆时，文革形势跟大串联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派别对立争斗变得激烈了，出现了许多造反派组织，打破了之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斗争矛头也指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了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好些大人物的口号。而当时，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也难以接受。

1966年12月4日，重庆的“八一五造反派”和“保守派”（“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两大对立派在大田湾体育场集会时发生了冲突。保守派举行会议，造反派冲击会场。文革初期派别冲突基本上都是这种方式。那时造反派兴起不久，“八一五”派人数相对较少，且多是学生，口水大战可以占尽上风，体力大战推搡撕扯就远远比不上身强体壮的工人老大哥，冲突起来自然有点势不均力不敌。

这个大会我参加了，是在保守派的队伍里。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超大型集会，我完全是稀里糊涂的，集会的目的、为什么会被冲击等等，一概不知，也没问更没想，就像一个影子悄然无声地跟着队伍进了会场又离开了会场。后来唯一有点感觉的，是庆幸自己在人贴着人完全不是自主行走的拥挤中，没被踩死。

大会开始不久就受到造反派冲击，一片混乱，我们被带领离开会场，到大街

上去游行。与会者离开后，地上全是踩掉的鞋子、传单和一些其它物品，据说还打死了几个人（后称作“一二·四”惨案）。“八一五”派在市区内抬着尸体（也有说不是打死的，而是从火葬场和医院太平间抢出来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游行，还派人到北京中央文革去告状，把事情闹得天大地大。事件发生后，“八一五”派创作了一首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

1. 读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同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同志！

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面对邪恶敢于斗争，你站在毛主席像前传播真理！

2. 手捧红宝书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同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同志！

会场中你高喊“8·15”好，万人丛中你挥舞战旗，你眼看战友在血泊中倒下去，你冲向大会主席团造反有理！

3. 唱起了造反歌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同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同志！

小闯将活跃在山城里，会场中你呼口号最有力，恶棍抓住你乱踢乱打，你面对着死亡不把头低！

（副歌）

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的青春夺去。亲爱的战友，你永远活在、活在我们的心里！

虽然是文革歌曲，旋律却哀婉凄美，演唱起来非常煽情，估计赚了不少群众的眼泪，所以，在重庆市广为流传，喜欢这歌曲的也不仅仅限于“八一五”派成员，比如当时我这个“保皇派”。

事件后，中央文革的某一位成员讲了话，称重庆“八一五”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工人纠察队”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方向是错误的。由于中央文革的定性，“工人纠察队”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兵败如山倒。

父母逼我脱离“保皇派”

此时“八一五”在各个领域势如破竹，大、中学校的“思想兵”、“赤卫军”已经纷纷倒戈，原先的组织摇摇欲坠。我原本是被排斥在“思想兵”组织之外的

“赤卫军”成员，团结对象，此刻却立场无比坚定：我坚持不参加学校里属于“八一五”派的“九八战斗团”，跟着只剩下寥寥数十人的“思想兵”——这个组织名存实亡，没有也组织不起什么活动了，我们三十多人的大寝室里留下了我和同班另一个姓余的女生，她是矿工的女儿。我们跟着一个特别能说会道的高中男生，也没什么活动，每天在一起听他讲，讲的具体内容已不记得，只记得自己当时特别崇拜他好有知识哦！

那时，我母亲在观点上已经属于西师“八三一”，父亲因形势变化，也不再倾向于原来的“思想兵”保守派。父母和子女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派别。离开家就有些像革命时代瞒着父母出去参加革命一样，长期被父母用革命历史小说和现代军旅小说培养得充满革命英雄主义浪漫情调的我，面对摇摇欲坠的保守派，心里反而升腾起一种类似大革命失败的悲壮感，我决定再也不回家。

学校食堂已经停伙，校园里空荡荡的，我们两个女生在宿舍用三块砖头支成一个灶，把被别人损坏了的桌椅板凳当作燃料，天天在寝室里煮面条吃。没有调料，去校外小卖铺买一点豆瓣酱来拌一拌，缺油少味地吃。当我们把一切都用“革命”这件外衣包装起来的时候，内心就被“革命的乐观主义”完全占据，一点也没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这样的日子也很快维持不下去了，那位女同学选择了回家。我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跟着几个高中女生去了一家街道纺织厂，“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那是一家从厂房到设备再到生活条件都极其简陋的工厂，厂里设备属于什么年代我不知道，但第一次走进时，那震耳欲聋的噪音几乎让人崩溃。不知道长期在那里上班的工人怎么捱过来的，我每次下班从车间里走出来，基本上听不见别人说话。她们的女工宿舍也让我震惊，跨进宿舍门，眼前呈现的是如此逼仄的空间，床与床之间只有一个人侧着身体的距离，阴暗潮湿，白天晚上都一样，不开灯啥也看不清。和女工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在她们的脸上，没有见到过宣传画上的纺织女工那种载满幸福和欢乐的笑容。后来回忆那个场景，也总是禁不住联想起夏衍的“包身工”……

我们是为革命自愿到这里来的，所以没啥好抱怨。我被安排在纺纱车间（噪音比织布车间略低），和女工们一起三班倒，没有报酬，厂里也没给我们任何特殊待遇，轮到上深夜班，论年龄还应算是童工的我，半夜12点照样爬起来，睡眼惺忪地冒着刺骨的寒风去车间干活。在那里我的收获是学会了接线头，这门“技术”现在还能使用。

在工厂上班，伙食费得自己出，我的口袋里终于在某一天没有一分钱了。除了父母之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我不得不想到回家。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我幻想

回家去要一点钱，再出来革命。

其实我那个时候回家就是自投罗网。父母之所以没出来找我，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既然我自己回到家里，那就肯定不允许我在“革命”和“反革命”都分不清的情况下，继续到外面乱跑。时逢我回到家那天，一位发小的父亲来我们家询问他女儿的下落，我知道的情况是，她跟着学校“思想兵”最后组织的宣传队，到周边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去了。她父亲问清女儿的去向后，说要去把她找回来。

发小的父亲走后，我不合时宜地提出要回学校。父亲火气很大，大吼：不许去！此刻，我自以为是一个参加了“革命”的“革命者”，和读书的时候不一样了，“革命”让我有了与父母叫板的资格，就对父亲说：我要走，你也管不到！

父亲怒发冲冠：你敢走，我打断你的腿！

我摆出了来自革命小说的革命者应有的万丈豪情，犟嘴道：你打断了腿我爬也要爬走！

父亲正在杀鱼，听了我的话，“哐当”一声把刀扔在地上，一条活鱼“吧唧”被甩在地上，死了。面对家长的威风，我一下子退缩了，不敢再硬顶硬撞，但内心也没屈服，暗暗盘算换一种策略，想着等到晚上，趁父母熟睡时悄悄溜走。

当晚母亲病了，美尼尔氏综合症第一次发作，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稍稍动一下就惊天动地地呕吐。真是天意啊，我只好留在了家里，照顾母亲。

母亲病好后，没有因为我这段时间尽力照顾她而心慈手软，放我离开。父母非但不让我离开家，母亲还天天“押”着我去学院办公大楼一带，看揭露走资派内幕的大字报，以及观看针对原“思想兵”主要头目和支持“思想兵”的走资派，那些大大小小的批斗会。目的是让我思想转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这时，之前那个超级巨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已彻底不复存在，我即使成功从家中出逃，也无处可去无路可走了，所以，只好每天被迫跟着母亲，在张贴大字报和开批斗会的办公大楼、员工一食堂等地方转悠。看着那些往日的“领袖”、骨干人物被群情激愤的造反派辱骂、推搡、捆绑、下跪、请罪，虽然我和他们算不上认识，但我的眼里却蒙上一层泪水，干了，再蒙上一层……

我加入造反派还荣幸地当了红卫兵

我后来之所以转变了立场，并非因为看了那些大字报和现场批判，而是因为我哥哥也参加了西师“八三一”造反派在附中的组织“布尔什维克”。我在父母的允准下回到学校，在递交加入“九八战斗团”的申请时还有些战战兢兢的，生怕被拉去下跪，向毛主席忏悔，写悔过书。文革期间，大到国家级的“走资派”，

小到中学生，成千上万人都有写检查、下跪的经历。那时流传很广的一段顺口溜是这样说的：

站不完的队，
请不完的罪，
写不完的检查，
流不完的泪。

我在“造反大楼”（学校新建的教学楼，还没怎么用就开始文革了）的三楼，见到了同班同学王××（后在武斗中因车祸遇难了）、吕××等老“九八”战士，他们接收了我的申请，对我还相当热情。我们学校“九八”战斗团是一个上千人的庞大组织，除了参加大型集会和上街游行，其余很多活动还是以原先的班级为单位开展，但不再叫什么班，而是取了当时很时兴的名称，比如我们班就叫“九八战斗团驱虎豹战斗队”。（右图：驱虎豹战斗队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左1为作者。）



不久，我们战斗队到嘉陵江对岸的天府煤矿开展革命活动——主要就是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宣传“八一五”造反派的主张。在那里，我被批准加入红卫兵——此时的红卫兵已经完全不同于运动初期，不再有以红卫兵的名义

组织的任何革命行动，所谓红卫兵差不多就是造反派组织内部的一种政治待遇，各个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并非人人都是红卫兵。加入红卫兵有什么条件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提出过申请，一个出身“非红”的前“保守派”，能够被接纳加入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已经非常荣幸了，没敢有更多的奢望。被吸纳为红卫兵，让我这个自打有红卫兵组织以来就一直只能在“红外围”里向往革命的另类人物，受宠若惊。开始，我以为是搞错了，跑去问“勤务员”（那时红卫兵组织的头儿称“勤务员”，以体现官兵平等），我又不是“红五类”，怎么也批准加入红卫兵了。“勤务员”回复，我们主要是看表现。我真是喜出望外喜不自胜还感激不尽，从此成了一名坚定的“九八”战士。

在“二一九”体验“革命风暴”

上海“一月风暴”掀起后，夺权风暴席卷全国，重庆市也不例外。夺权和围绕夺权出现的许多上层争斗内幕，我这种小虾米一样的人物完全不可能知道，也根本搞不懂，我们看到的只是现象：原先和“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保皇派进行殊死斗争的造反派，在夺权风暴中分裂了。北碚区的西南师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和沙坪坝区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分别成了分裂后两大派别的旗帜，新的、更激烈的派别斗争拉开序幕，逐步演化升级成为大规模武斗。

当时重庆市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取代重庆市委与市人委（政府），以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为首的一派，反对并提出要砸烂这个“革联会”，被称为“砸派”。后来改称“反到底”。

北碚区除了西南师院外，还有一所西南农学院（现两校已合并为西南大学），还有一所四川外语学院后来搬到沙坪坝区去了。西农“八二六”战斗团和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以及我们学校“九八”战斗团属于一个派别，而且人数都在本院本校占绝对优势，因此，在北碚区，“反到底”派的力量比较强大。

1967年2月19日，距离1966年12月4日（“一二·四”事件）不过两个月余，历史就惊人相似地重现一次。派别间剧烈冲突的形式没变，造反的对象变了——受批判的不再是旧时的重庆市委，而是刚刚建立的新政权“革联会”；发生冲突的各大组织也变了——以前同一战壕的亲密战友反目成仇。

据何蜀先生编撰的《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记载：“1967年2月19日，新成立的革联会原准备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斗李井泉大会，因反革联会一派抢先占据会场，批斗会改在长江边珊瑚坝召开……与此同时，反革联会一派在体育场召开‘反右倾’大会，拥护革联会一派的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战斗团、六中32111战斗团、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等冲击会场造反，两派发生冲突。反革联会一派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与革联会一派发生冲突，多人受伤。”

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我跟随我校“九八”战斗团参加了大田湾体育场的大型集会。因为年龄不大，又属于刚刚加入的“基层小兵”，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清楚，比如谁主持集会、集会的主题等等。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们的组织和其它“反对革联会”的组织一起，将在集会上公开宣布跟“伪革联”势不两立。上层怎么策划的我们不知道，进会场的时候，一切正常，我们并未受到任何阻拦，或发生任何冲突。

因为预先被告知了参加这次集会目的，我内心暗暗期盼着憧憬已久的革命暴风雨。集会开始后，在一个预定的时间，会场中“反革联会”派的各个组织同时摇旗呐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并在主席台上用高音喇叭表达砸烂“伪革联”、

革命到底的决心。这一次，我的角色转换了，成为了造反派的一份子，有了“自主革命”的意识，和“一二·四”集会的状况截然不同，在满怀革命激情的我眼里，整个场面就是想象中的“五四运动”或“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现代版或重新演绎，革命小将摆出了视死如归的阵势，十分壮烈。

不久，两派开始冲突。对立的双方都自称为造反派。对方迅速组织起队伍，把我们这些“反革命的砸派”扔出会场去。

我们“九八”战斗团的队伍站在主席台右下方观众看台上，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的队伍在我们旁边。混战开始不久，一个“八三一”的女大学生被抓住了，在即将被抬起来往看台下“扔”的时候，她把一摞“八三一”的小报匆匆交给了站在旁边的我，女战士只来得及喊了一句“小鬼，帮我保存好”，就从体育场的看台上消失了。（下图：作者当年留影。）



我接过报纸的那一刹那，像是从奔赴刑场的革命志士手中接过当年重庆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一样，心中充满“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悲壮，决心向“八三一”的大学生姐姐学习，把以前在书中读到的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运用到实际行动中。在激烈的冲突中有同学脱下了棉衣，让我帮忙抱着。此刻，我用那棉衣小心地把报纸包起来。就在我包裹报纸的时候，对方的斗士已经盯上了我，只听见有人大声说“这个，这个”，还没搞清楚咋回事，我的身体就悬空了，我被数只有力的手高高举起，像扔装着红薯、

土豆的麻袋一样，抛下了看台，怀中的报纸天女散花一般在看台上空飘飞……

滚落下看台后，对方没有给我站稳脚跟的机会。从看台下的运动场一直到出口大门，对方群情激昂的战士组成了一个人体通道，我在这个通道里被推来搡去，耳朵里塞满了恶狠狠的叫骂声：“小反革命，滚出去！”“龟儿子人不大点儿，啥子没学会，就学会反革命了！”“格老子跑来造反，造你妈的反，滚！”我就是这样脚不沾地被“滚”出了会场。到了体育场外，我在大门口见到了自己组织里的高

中同学，压抑了半天的眼泪突然井喷，拉着大同学的手泣不成声，像是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党组织的地下工作者。

后来，两派都离开会场开始游行。我们的队伍从体育场门口开始就被对方围攻骚扰、撕扯扭打，一路艰难前行。走着走着，我远远地看见了游行队伍中的我哥哥，他正在一边高声喊着和几个人撕扯，一边护卫他们组织的战旗，嗓子都已经嘶哑了。我扭头自豪地对旁边的同学说，看，那是我的哥哥！那心情就像我哥哥是《红岩》中的成岗，而我是成岗的妹妹成瑶。

西师武斗后在医院护理伤员

“二一九”集会之后，两派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斗争方式也逐步升级。到了6月，发生了第一次规模大、双方各个组织都有大量人员加入的武斗，那就是西师校园内发生的“六五——六八”事件。事件的起因现在看起来简直匪夷所思，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原本莫名其妙的一些摩擦，就会演绎成血肉横飞的惨剧。

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人数众多，在学院里占据了绝对优势，就想净化校园，遂勒令对立派“春雷”造反兵团（“二月镇反”时成立的组织，其队伍基础是文革初期西师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撤出他们据为总部的图书馆新大楼。

“春雷”坚决拒绝了“八三一”的无理要求，为了保卫他们的据点，就在大楼里封楼梯垒石块，把一个本该存储知识传播知识儒雅宁静的地方，变成了迎接血腥战斗的堡垒。

“八三一”勒令无效就武力攻打。双方都向各个学校（特别是中学）同一派别的组织求援，战斗规模迅速扩大，进攻方英勇顽强，守卫方视死如归，战斗越来越激烈，双方都有不少人员不同程度地受伤，还传说死了人。“六五——六八”事件后，西师“八三一”也创作了一首歌，纪念武斗中的死难战友，歌名《高山流水唱战友》：

缙云山，松涛吼，嘉陵江水滚滚流，高山流水放声唱，歌唱西师“八三一”战友。

战友忠于毛主席，战友是铁打的硬骨头，二月黑风压不倒，冲破浓雾迎来红日头。

但见校园里红花血浸透，不见战友在红楼，往事如画心潮涌，话儿出口似水流。

多少个白天多少个夜，多少次打击多少次战斗，我们一同冒着烈日游行大街走，我们一同炮轰市委征战不休。

为了砸烂伪革联，我们一同遭受了多少次围斗，实难忘掉今年二月一十九，我们一同被围在解放碑街头。

今天啊，斗争到了紧要关头，保卫毛主席英勇战斗。战友啊战友，敌人向我们伸出魔手，刀光剑影血溅红楼。任那敌人铁棍打、鞭子抽、用刺刀挑往监狱丢，敌人围困万千重，不弯腰来不低头。红心永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不丢。战友……战友，今日祖国江山秀，毛主席在向我们招手，抬头仰望北斗星，一轮红日在心头，在心头。

这首歌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一样，在那个年代催人泪下，是我们当时特别喜欢的歌，几十年过去了，未曾遗忘。

武斗一开始，我就跟随“九八”组织的看护队去了北碚最大的医院——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任务是护理伤员。

医院专门挪出一些病房供那次武斗受伤的人员留医。我没留意对立派的伤员住在哪里。我们这一派的伤员，集中在几间大病房和病房外周围的过道上。

伤员们进来的时候，很多都血肉模糊，跟战争年代一样。我们护理人员也各自分配了任务，我和另一名女生负责照顾的伤员中，有一名重伤员叫苏红江（音），是二十二中的男生。他被送进来时昏迷不醒，但脸上身上都没什么血迹，好像是内伤。头两天他一直昏睡，疼痛厉害的时候，会抓住身旁的东西用尽全身力气捏，却从来没有叫喊过一声。这是我在革命小说中读到过的情节现场再现，我是真被他这种英雄主义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伤好后，我们都离开了医院，各自回了自己的学校，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还有一个伤员，看起来不像学生，送进医院就没苏醒过。那天晚上，护士让我用一个皮球一样的东西一下一下地按，可能是往他鼻子里送氧气，我也不太懂。那一夜我没睡觉，守在不知是死是活的伤员旁边也没感觉害怕，只是不停地按那个“皮球”。他一动不动。那时也没有什么仪器观察生命体征，直到第二天早上，医生才宣布他死了，然后被人抬走。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比如姓名、年龄、是哪个学校或单位的人员，等等。

在我当护理的日子里，有一天，医院里闯进来一群头戴安全藤帽手持钢钎的对立派，他们满脸杀气地从这间病房走到那间病房，手里的钢钎把地板戳得“砰砰”响，凶狠的目光刀子一般在病房里划来划去。手无寸铁的伤员、护理员以及医院的医生护士全都沉默着，在那种情况下，一粒唾沫星子也许都会引来一场血腥杀戮的风暴。我的心就像是一只迎头撞上了大灰狼正在百米冲刺逃命的兔子，脑子也没闲着：如果打起来了该怎么办？怎么救伤员？怎么逃出去？要不要、敢不敢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抵挡对方刺过来的钢钎？悲壮更兼恐惧，各种念

头在脑袋里狂闪。所幸，那帮人示威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发生流血惨案。他们来干什么？为什么又走了？无人知晓。

我在医院一直待到我们全线撤退到西师前，护理的几个伤员都基本好了，就跟伤愈的西南农学院大学生去西农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西师跟着自己学校的队伍。

“叫花子”借钱

我父母带着弟弟离开西师去九龙坡区茄子溪乡下避难之前，父亲找到我，问我愿意跟他们走还是跟学校。我毫不犹豫地回复父亲：跟学校。父亲嘱咐了我一些事，又拿了20元钱递给我，让我拿10元给哥哥。他们三个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我就知道了。

此时，西师校园已经成了北碚区我们这一派的前沿，武斗使用的冷兵器开始向热兵器转换，最先使用的热兵器是小口径步枪。那天，我们在西师文星湾校门附近放哨，我们班一个家住文星湾的女生趴在围墙上，和墙外的熟人打招呼，只听见“砰”的一声，那个女生“哎哟哎哟”地大叫着从围墙上跳下来，用一只手按住另一只手的手腕。她的手腕被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击穿了。当时，我站在她身后不过几米远的地方，或许因为个子小被围墙挡住了，没受到枪击。

武斗日渐激烈，我们“九八”战斗团的头儿，考虑到今后四处转战女生就是个拖累，开始动员疏散。

我原本是想按父母离开前的嘱咐，去歇马场那个代号“424部队”的军校找父亲的军人朋友，看看他们能不能带我离开重庆，或找到父母在重庆郊外茄子溪居住的具体地址。我还没有行动，我们家以前的邻居姐妹俩突然找到我，说想约我跟她们一起走。我们家搬离文化村五舍以后，跟她们再没了联系，想不到她们姐妹会主动来找我，还显得特别亲切。我被打动了，但完全没想过去哪里、怎样去、吃饭住宿怎么解决等一系列问题，就点头同意了。

我去跟哥哥告别，把父母留给他的十元钱给他。我哥是跟着他们西师附中的组织走，吃饭不花钱，他考虑我独自外出，肯定要花钱，就把那十元钱又给我了。

我们三个女生于次日一起上路了。位于城区的汽车总站已经是对方的地盘，我们只能选择经歇马场、青木关翻越歌乐山这条路到了市中区。她们姐妹和我经熟人介绍住进重庆市话剧团，在一个空房间里睡地铺。

住了下来，才知道她俩只有几元钱。邻家大姐是高中生，我自然而然把她当成了依靠，并把自己的二十元钱尽数交给了她。

一段时间后，随着重庆武斗的升级，话剧团一带不再安全，不能继续住下去

了。邻居姐妹提出要去贵州她们的姑妈那里。我们没有经济来源，买火车票的钱自然没有，只能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混车，但这么远的路，不备一点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她们想不出什么办法，我便自告奋勇去借。

我父亲有一个姓秦的学生，我们叫她秦嬢嬢。她毕业后留校成了父亲的同事，我们在文化村五舍居住时，她家也在那里，我们是邻居，而且两家人关系一直相当好，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互相端来送去是常事。后来秦嬢嬢调到重庆团市委工作，“思想兵”垮台后因为和我们观点不同，就慢慢断了往来。我在市区里并没有什么亲戚或认识的人，能借钱的只有她，却不知道她住在那里。我想了个守株待兔的办法——跑到团市委大门口去蹲守。等待的方法也有些像暗中监视，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我远远看见秦嬢嬢从办公楼里出来了，就悄悄地跟在她身后，一直跟踪到她家。

我突然出现在秦嬢嬢家门口，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却没有喜。我不会弯弯绕，凭着过去两家的老关系，直截了当把来意说了。秦嬢嬢问我借钱干什么，我回答去贵州。又问：你不去找父母，跑到贵州去做啥？我不假思索回复：去革命。秦嬢嬢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说：革命？你懂得啥子叫革命？我心里很不服气，因为那时我们都把自己看成最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但我沉默着，没什么知识的我原本就不会辩论，秦嬢嬢算是长辈，我就是巧舌如簧也不便于跟她争辩，更何况我的目的是借钱，不能有丝毫敌对的言语和情绪流露出来，秦嬢嬢和我不是一派，她很有理由也完全可以不借钱给我。

我低着头，因为紧张，手指无意识地在裤子大大小小的破洞上来来回回地抠。秦嬢嬢怜惜道：你看你，穿得像个叫花子一样还到处乱跑，不去找父母，这就是你们的革命？我红着脸不说话。

那天我的确穿得非常褴褛。当时许许多多离开父母跟着“组织”在外面“干革命”的中学生差不多都这样，只穿了一套衣服就离开了家。两派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以后，家回不去了，就只好一套衣服晚上洗了白天穿。我在西农那段时间，捡到了一条破烂裤子，就拿来和自己的一条轮着换洗，去秦嬢嬢家那天刚好轮到穿破裤子，完全像个叫花子样。这身打扮歪打正着，增加了我借钱的筹码。秦嬢嬢是一个心地善良通情达理的长辈，她给了我十元钱。十元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他们的月工资也就是五六十元。秦嬢嬢让乞丐般的我在她家吃了午饭，还给了我一条裤子，让我告别了叫花子装束。

艰难路途上善良的陌生人

借回钱后我老老实实如数交给了邻家大姐，我们就动身了。同行的还有西师

子女段姓两姐妹（妹妹是我的发小），另外有市中区某中学的两个女生，不知怎么认识的，也和我们一起。

自打免费串联以来，人们都养成了乘车不给钱的恶习，交通部门采取措施加强管理后，已经养成不付钱恶习的“乘客”又想出各种招数来对付交通部门的措施。到了武斗时期，混火车的手段不再是不买票，票必须买，不过是只买一两个站的票而坐完全程。慢车一个站距离很短，花钱就很少。我们每人花几角钱买了到小南海站的票，车不挤，每个人都有座位。坐是坐得舒服了，但列车员查起票来也十分方便，因此大家心里都装着十五只吊桶。

列车过了赶水进入贵州境内。那一带都是幽深的大山，让人产生无穷遐想的景致缓缓地从小窗外流过，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欣赏窗外风景的闲情逸致，心里七上八下的只有一个问题在翻腾：查票了该怎么应对。正盘算着，车厢里一阵躁动，查票开始了。我们赶紧趴在座位间的小桌子上假装睡觉，想蒙混过关。可是列车员不吃这一套，站在我们面前把桌子敲得砰砰响，声音里全是蔑视：哎哎哎，睡啥子睡？查票！查票！列车员见惯了各色逃票人员，目光老辣，一眼就看出我们几个是混车的。无可奈何，几个人只好坐起来向列车员解释，可怜巴巴地述说，我们是躲避武斗出来逃难的，跟父母走散了又没有钱……试图引起列车员的同情。列车员不为所动，板着面孔毫不通融：不行！混车的我们见得多了，到下一站你们自己下车，不下的话，我们就找人来拖！

这是最后通牒。

下一站是个无名小站，两边都是高山，小站在山的夹缝中孤零零地趴着，只有三两间房子，几个工作人员，前面没有村，后面没有店。我们几个女生没有丢人现眼地让人拖出去，自己下了车，不管怎样面子还是重要的。下车前另外几个人都把女孩子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哭——拿出来了，但没有取得任何希望的效果。我没哭。文革以来，我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小姑娘。这种心态虽然现在想起来非常可笑，但的确是哪个年代很多青少年的真实状况。

因患了几天感冒，我的嗓子完全嘶哑了，说话特别吃力。下车后，我看见有人走过来观看询问，就沙哑着嗓子讲起了重庆的武斗，讲起了我们的处境：离开家独自逃出来，父母也不知在哪里，身上又没有钱，坐了这么久的火车连饭也没吃，等等。站在我旁边很仔细地聆听的，是一个火车司机，他关切地询问了我很多细节，对我们的遭遇表示了格外的同情。火车司机当过兵，他说当兵几年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大规模打。接下来，他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他要让我们几个乘坐他的机车头，把我们捎带到遵义去。我兴奋地跑去把好消息告诉了还站在一边哭泣的其他人，几个女孩随即破涕为笑，兴高采烈地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坐上了火车头，还是内燃机车。

距离遵义大约还有十余公里的地方是一个机务段，因为要换火车头，好心司机的机车不能再往前开了。我们一路上只顾兴奋，也没问过火车司机姓甚名谁，他在开车，我们也没好和他交谈。下了火车，他的机车就开走了，好像都没挥手告别一下！现在回想起来，满满的都是遗憾和歉疚。

从火车头上下来，我们一下子又像吊在了悬崖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这个车站也不大，但再也没有好心的火车司机救世主一般出现在我们眼前。机务段附近有一个铁路技校，我们胡乱转悠了一阵子，不知道邻家大姐怎么就和铁路技校的几个男生攀谈上了，他们颇有同情心，也非常侠肝义胆，当即帮忙找了一列去贵阳的货运列车，让我们搭乘货运车尾部的押运车厢。

列车要第二天早上才启程。

折腾了一整天，天也渐渐黑了下来，肚皮早已前胸贴着后背，没完没了地咕噜噜响。邻家大姐让我去找吃的。我们下车的地方连个小卖铺也没有，根本买不到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想来想去，唯一可以找得到食物的地方就是附近的农民家里了。寻找到散布在山里的农村院落也颇费周折，当我们疲惫的双腿终于跨进一家农户的时候，天已经黑成了锅底，农民们早就吃过了晚饭。贵州自古以来就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农民家里没什么现成的东西可以吃。那家人还算热情，立即让一个小伙子到地里去掰回来很多新鲜嫩包谷，煮了一大锅。我们站在农民幽暗的厨房里，煮包谷的清香味满屋子飘荡，饥肠辘辘的我清口水止不住地往外涌。

不过，农民的热心和帮助跟火车司机截然不同，农民要钱，要一元。要钱是应该的，包谷长在他们的自留地里，是他们一颗汗珠一颗汗珠浇灌出来的私人财产，那么一大锅包谷要一元钱并不过分。可是邻家大姐不乐意。我一方面觉得农民那么热情，给少了过意不去；另一方面肚子实在太饿，巴不得马上把香甜的包谷吃到嘴里，就悄悄对她说，一块钱不贵，买了吧。邻家大姐一听，脸垮得比山体滑坡还快，她不说话，只是用一双眼睛在我脸上一下一下地剐。到我们买好包谷离开农民家，大姐雷霆大作，一直骂我骂到我们下车的那个小站。

我泪如泉涌。从重庆出来一直在感冒，饿了一整天，还跑这么远的路找吃的，买包谷一元钱就算贵了，可从西农出来，一路上花的钱都基本上是我的，凭什么还要挨骂？我转身跑了，到那列货车尾厢上，在黑暗中独自坐了一会，蜷在长凳子睡了，什么也没吃。

到了贵阳，我们一行五人先借住段姓姐妹的亲戚家。邻家姐妹的姑姑在距离贵阳几百公里之外的专县，买票去是不可能的，混车就更不可能了，唯一的办法是搭乘不要钱的货运卡车。

想白坐车又没有熟人，那就要去把陌生人变成熟人。把陌生人变成熟人靠的

是什么？是脸皮和嘴皮。这两皮都恰恰是我的弱项。我们在货运车站转了一天，无功而返。第二天邻家大姐开始训斥我，你怎么这么没用？只晓得吃！只想等人家找好车你来坐现成的！你是啥子大小姐么？哪个该侍候你啊！

我横下一条心壮着一颗胆厚着一张脸，去找车。可我不知该问谁，怎么问。在那个货运站看来去，看到一个面目慈善的年轻人，凭着直觉就过去了。苍天有眼，我又遇到了贵人。那是一个跑长途的司机，刚好三天以后要去那个地方。司机是个四川人，五十年代支援山区建设移民到了贵州。他认真倾听了我关于重庆武斗的描述，以及我们的眼前的困境后，一方面因为乡情，另一方面因为对我们的同情，他十分爽快地答应带我们去那个专县。不仅如此，他还立刻带上我们仨，到他一个结拜姐姐（也是四川人）家住了三天，管吃管住没要一分钱。

三天后司机带我们上了路。一路上司机非常照顾我，一直让我坐在驾驶室的副驾驶位置上，邻家姐妹则轮换着，一人坐货箱，一人坐驾驶室中间那个位子。我们在途中还住了一晚，第二天准备上车时，邻家大姐拿眼睛斜着我，命令，该你坐货厢了。司机不同意，他说这个小妹儿晕车，就让她坐下面。翻过一座又一座似乎永远翻不完的山，司机一直把我们送到邻家姐妹姑姑所在的中学校门口。我心中万分感激，一再道谢，可是我忘了询问司机的名字和联络方式（现在连姓也忘了），又留下了一份永远的遗憾。

文革中的小城印象：贫穷与安静

我们落脚的专县在贵州不算太小的城市，可能因为地处大山区交通不便，那里没有武斗，我们住在那里，感觉文革的氛围也不浓厚。

邻家姐妹的姑姑所在学校，这时也处于瘫痪状态，教职员工不上课不上班，校内也没有学生，大约都“停课闹革命”去了。或许姑姑属于当时的“逍遥派”——我没有问过她，但我确实没见到她参加过什么派性组织活动，平时也从来不谈这方面的事。我在他们学校也从没见到过什么有组织的游行、集会、大辩论或两派冲突之类的事。或许是我们没有深入到他们的那些生活中吧，只觉得周围的邻居们都安安静静地过着平常的日子。记得姑姑还去学校借来了留声机和唱片，我们围在一起听。唱片里都是文革时期已经成为禁歌的那些曲目：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歌剧《江姐》中的“孩子啊，接过红旗打天下”等等。姑姑隔壁住着一个青年男教师，他有两个妹妹来自从贵阳到这里途中叫做大方的城市，据说大方有武斗，姐妹俩来哥哥处躲避。他们兄妹仨经常围在靠窗户的书桌前引吭高歌，我记得他们唱得最多的是一首派性歌曲《‘四一一’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他们这样毫无顾忌慷慨激昂地抒发性情感，也没人出来怼他们。只有这歌声才

让我略微感受到一点文革的气息。

记忆中，邻家姐妹的姑姑所在学校和城市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贫穷和安静。大街上摆着卖小吃的摊位，一张破旧的桌子，摆放几个小小的土陶碟子，碟子里面有十来块2厘米见方的米豆腐，上面淋点酱油，苍蝇围绕着碟子嗡嗡地飞，既不卫生又不美观，我没吃过，但见到有人吃。街上的商铺营业都正常，我和姑姑常常去一家豆腐作坊买豆花，便宜好吃且有营养，是那时最适合我们经济状况的菜肴。我在街上一家比较大的民族商店买过一块肉色的丝绸面料，和一副塑料手镯，都带回重庆了。还有点印象的，是城里有过一次规模很大的赶集，街上的人摩肩接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赶上了什么节日。那次赶集的结果，是邻家姐妹在拥挤中被染上了虱子。

那些时日留给我的一个特别深刻记忆，是邻家姐妹姑姑带我们去看“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电影，虽然也知道那是专供批判上演的，可从电影院出来一路沉默的我，内心有两个强烈却不能说的感觉：一是觉得电影太好看了，二是觉得心里非常难过——珍妃被逼死、光绪被囚禁、以及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让我一次次泪涌，却又绝对不敢哭，我是强忍着眼泪看完的。走出电影院，脑子里晃的全是美丽的珍妃和忧郁的光绪，对他们充满同情，根本不知道该批判什么。

邻家姐妹的姑姑是一个很好的长辈。她是中学教师，月收入五十余元，家里一下子来了三个人，我还是一个外人，又不能立刻交上伙食费，应该说给她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可是我在她家住了三个多月，从来没有看到过她有任何不满的表示，连稍稍不好看的脸色都没有。

为了弥补我不能及时交伙食费带给别人的麻烦，一到姑姑家，我就主动干各种家务活，洗衣服、提水、搬煤、做清洁和跟着她去买菜，等等，凡是家里需要做的，我都做。

那期间，我试着给我的五叔——四川遂宁拦江中学的老师——写了一封信，告知我的处境，问他能不能给我寄些钱和粮票，帮我临时解困。那个年代，邮政运行还保持着基本正常状态，五叔不但回了信，也很快寄来了钱和粮票。

有个细节值得记录一下，我哥哥武斗期间跟着学校的队伍，生活一直很动荡，他想给父母写信却没有钱买邮票。那时邮局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寄毛主席著作可以免费。我哥哥灵机一动，就在一本捡到的毛选空白处给父母写了信，拿到邮局去寄了。我父母真的收到了我哥哥的信，他们也因此取得了联系。

重庆武斗第一个高潮过去后，父母从五叔那里得知我的地址，给我写了信，寄来了钱和粮票，我还清了欠邻家姐妹姑姑的伙食费，还有钱用作回家的路费。

我们决定回重庆了。返回贵阳我们买了车票，连续两天的长途公共汽车，我

一直坐在挨着过道的座位上，晕得一塌糊涂，吐得死去活来。到贵阳后，我们还待了两天才乘火车返回重庆。其间，我提出要去看看收留过我们的人家，邻家大姐坚决不同意，没去成。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姑娘已经成了时光隧道远端模模糊糊的影子，不知道收留过我的人（包括邻家姐妹姑姑）和帮助过我们的司机（包括火车司机、铁路技校的男生们）是否都还健在、健康？他们是否还记得曾经无私地帮助过的那几个遭遇困境的女孩？我所记得的，也已经不是他们的容颜和他们的姓名，而是虽然身处那个毁灭人性的疯狂年代，不过是一些小人物的他们内心依然保存的那份单纯和善良，是他们依然拥有的不求回报的爱心付出，是他们对陌生且身无分文的我们给予的人道关怀。如今，在这个浮躁、浅薄、追逐金钱的社会里，这样纯粹状态的真情还能找得到几分？

【生逢乱世】

话说“新三届”中学生中的红卫兵执勤连

杨革非

《昨天》编者按：提到红卫兵，现在一般人都只想到文化大革命前期1966年到1968年的大中学校里包括高干子女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等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但对于1968年秋工宣队进驻全国大中学校“占领上层建筑”、1969年全国“老三届”中学生被赶出城市“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整体结束之后，城市中学里的“新三届”中学生里再次建立起来的“红卫兵”，后人在谈及文革时就很少会再关注，许多人甚至以为红卫兵这样的学生组织在1969年之后就不存在了——因为“新三届”中学生里的“红卫兵”已经不再像前些年的红卫兵那样在社会上以“造反有理”为口号兴风作浪冲冲杀杀了。1969年后各中学里的红卫兵，实际上替代了原共青团（在小学则是“红小兵”替代了原少先队），成为学校里的一个由官方（校革委会、工宣队、军宣队及新建的党委、党支部）掌控的“群团组织”。直到文革结束之后的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作为文革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工作在不断加强；少先队和学生会也正在恢复。红卫兵的存在，使学校中学生组织重叠，学生干部负担过重，矛盾很多。普遍认为，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报告》要求，“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以学校为单位，认真做好红卫兵组织的结束工作。讲清它不再继续存在的道理，勉励

青少年学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直到这时，名为“红卫兵”的这个组织才不复存在。

本文作者是文革中期重庆第二十九中学的“新三届”学生，曾任校红卫兵团执勤连连长。他的回忆，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一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历史。

“新三届”这一批学生本来按正常情况，应该在1966、1967、1968年进入中学学习的，因文革停课闹革命，在家耍了三年。到1969年9月，我们才一起进入了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学习。总的说来，当时老师管理到位，学生也能按要求做，没有多少越界行为。

当时仅在二十九中，“新三届”学生就有3000人。从师资、教室等软硬件条件看，都捉襟见肘，不敷应付，形成很大压力。尤其是老师整体上还划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境艰难，在管理上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当时社会上有“群众专政”组织，来维护自己单位和周边地区的治安。而派出所几乎没有恢复正常运转，处于极不正常状况，只有很严重的刑事案件还在管，一般的小偷小摸、打架斗殴、流氓之类治安事件都没有足够力量去管理。把这部分职能推给了“群专”这种官办群众组织去处理。

文革初期66、67级大部分小学生参加过当时被称为“红小兵”、“小闯将”组织，也受到文革中造反派的一些影响。“复课闹革命”后，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周边的社会治安，学校就把“保安工作”交给了学校红卫兵团下属的执勤连负责。

由学生轮值来参与班级、学校的课堂、校园卫生、纪律秩序的管理，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做法。文革前后就是这样。但由固定的人专职负责，建立常设机构，并赋予相当程度的强制力，比照社会上存在的“群众专政”组织，就是文革中特有的现象了。

执勤连要进行解放军指导下的军事训练，不仅限于队列训练（包括队列动作、队列指挥、队列纪律），还有简单的格斗技术，以应用于抓小偷之类的社会治安执法。

二十九中红卫兵执勤连正式成立时间是1969年11月份。

据我所知，当时重庆市市中区所有的中学都有执勤连这样的组织，所做的事情也都一样，只是二十九中更突出一些。一是我们在校学生的基数大，有3000多人呢。二是地处解放碑闹市区，外面社会消极面对学校影响大，学校的风吹草动也会联动到社会。

二十九中红卫兵执勤连存在的时间是1969年11月到1974年，大概五年时

间，后来有了高中，社会治安也开始好转，公安机关职能恢复正常，执勤连的使命也就宣告完成。它是一个以前没有、以后也不可能再有的组织形式。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

执勤连最先只是执勤排，共有 30 人。当时全校学生都按军队的连排编制，分为两个营，一个营五个连，一个连有 5、6 个排，学校从一个连抽一二个人，只抽了 30 人，组成一个排，人比较少。由班主任老师提名，红卫兵团集中以后来确定。选了一个办公室，集中学习。由于人手不够，到 1970 年 6 月遴选的多起来，达到一个连队规模正规编制有 120 人了。

到 1971 年 9 月 71 级小学毕业新生入学，又增补了新人，补充、顶替已经离开学校支边、下乡的老生。规模达到 150 人左右。

第一次扩编（1970 年 6 月），在原来 30 人基础上，每个排（即每个教学班）由老师推荐一个表现好的学生。一营 50 人、二营 50 人。

最初的执勤排分一排、二排。一排对应着一营，二排对应着二营。一营上课的半天，由二排执勤；二营上课那半天，由一排执勤。

当时的学校主要是工宣队、军宣队管理。军宣队的解放军管队列训练，也教初步的格斗。工宣队领导学校革委会，红卫兵团的负责老师是符清国、廖先群老师。学校指定祝仁通老师负责执勤连的日常工作，符清国、廖先群老师他们也参与执勤连的一些组建和方向性的事务，经常来开会、听汇报、作指示，主要抓原则的工作。

学校红卫兵团有 10 个勤务员，相当于现在的学校共青团的团委委员。10 个勤务员都是执勤排的成员。到后来执勤连扩大，他们就淡出了一些，10 个勤务员有些分去抓宣传队，有些到宣传组。留下来的就有我、吴迅嘉、伍兴福、李小华和李瑞祥。

执勤连的组织结构大致就是这样：工宣队、军宣队领导校革委，校革委下面的符清国、廖先群、祝仁通老师管理学生，符清国、廖先群老师负责红卫兵团，由祝仁通老师主抓执勤排、执勤连。学生勤务员由我们几个来具体负责执勤连工作。

我们执勤连连部 1970 年下半年就搬到学校“飞机大楼”三楼上正中间那间屋子，正对着毛主席塑像背面的上方，也正好能看到学校大门。所以观察校门情况很清楚。执勤连每周开班排长会，老师基本上要来讲情况，每个班一周执勤内容都会写在小黑板上。比如这周连、排干部是谁值班，是哪班负责校门执勤，哪班负责社会执勤，哪班负责校内执勤，班里都有事前安排、事后记录。大的执勤活动全连出勤。

我们执勤的时间大致是分为两班：执上午班的同学早上 7 点必须到校，12

点放学完以后撤岗；执下午班的同学 13 点上岗，下午 6 点以后下岗，周日休息。范围就是学校及周边，解放碑地区的临江路、沧白路、九尺坎、大阳沟、中华路、邹容路及三八商店（重庆百货大楼）、公交车站等。执勤人员必须是男女生对半安排，不允许只有女生出去执勤的。

执勤的内容在校内主要是负责校门执勤（管理迟到及想早退的同学，处理出校门打架的行为等）。另外就是校内执勤（在上课时巡视各层通道，下课时在校内巡查，发现打斗的马上带到连部询问，写检查）。在社会上执勤主要是抓小偷扒手，制止打架斗殴，制止调戏女生的行为。

执勤连在社会上执勤较多的是制止斗殴，严重的就会送派出所。其次是抓扒手，抓到扒手以后自然是扭送派出所。

在校内主要是维护校门秩序，对迟到的同学以警告或延迟进校处理，另外就是维护校内秩序，发现打架的肯定叫到连部反省，写检查，态度实在不好的关到防空洞铁门内（当然是极个别现象）。偶尔也会处理排里送来偷同学东西的，这主要还是写检查。屡次打架的和偷窃行为严重的会在学校大会批判。

2019 年执勤连 50 周年庆聚会时，符老师说，现在二十九中请了 40 个专职保安，来负责我们当年所做的事情，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或制止打架斗殴等校门前和校园内的暴力行为，以及其他事务。可以想象，当年我们执勤连的学生们所做的那些无私奉献，还是值得称道的。

二十九中执勤连战斗精神强，队伍纪律好，又地处解放碑地区，在当时社会上群众的评价还是较高的。校方更不说了，这毕竟是他们领导下做的事，解决了“复课闹革命”以后学校秩序正常的运转，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执勤连同学是由老师推荐，在学习方面起了很好带头作用的同学。这些经历，对他们个人能力训练上也有积极影响，对他们的成长很有帮助。在同学中，在学校里，执勤连都有一定威慑力。调皮的同学还是有些怕执勤连。学生管学生，与老师管学生的确有一些区别。

从当时情况看，执勤连是在那时历史条件下，维护学校正常秩序的必要补充。毕竟不能让工人、解放军来把什么都管起来。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是不得已，而且很有必要，也起了积极作用。

从现在的眼光看，值勤连的作用也分积极、消极两方面。执勤连工作主流是好的。个别的，比如把打架的抓到防空洞关起，个别捆绑过激的行为，虽然少，但也还是有。但消极方面主要是当时的社会原因造成的。存在的问题不是说学生不该管，而是管理过程中难免有过头一点的地方。当时还没有后来才有的文明执法概念，思想没有这样的高度。个别执勤过程中，语言过激点，行为过激点，有几次跟派出所的户籍警到解放碑去抓卖粮票的，另外就是参与学校组织的对打架

斗殴同学的批判大会，记得当时被批的人还用绳子捆了的，会完了就解开放回去上课了。甩在防空洞口、锁在那里，拿绳子捆一下的事，是有的。对个别实在调皮的同学，打耳光、踢两脚，个别的也出现过。但打伤人的事情没有。

二十九中红卫兵执勤连，总的来说队伍训练有素，队列走得好，还经常拉出去在解放碑展示，把我们的风貌展示出来。学校宣传队在解放碑演出，去维护秩序的还是我们执勤连。那些调皮的人还是晓得执勤连的厉害，不得不有所收敛。

对这段历史，还是需要客观地看待，真实地记录下来。

【生逢乱世】

当年刻碑那桩事

王牧滋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掀起高潮，风靡全国。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些名言警句被摘录下来，汇编成册。

因这种书的封面都是用红色塑料壳作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之为“红宝书”，人们都以拥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为荣。

因此，书店里只要一有红宝书出售，人们便会争相购买。在那个时期，经常看见人们在新华书店门前排长队，不用问肯定是等着买红宝书。我曾经就在解放碑的新华书店排过长队，购买了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上有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关于林彪这一题词的来历，那时在湖北当阳曾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据史料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三国蜀将关羽与东吴孙权交战，兵败退至临沮（今湖北襄樊南漳县），遭东吴军队埋伏被擒，与其长子同时遇害。孙权割下关羽首级，运至洛阳送给曹操。同时以诸侯礼将关羽尸骸葬于当阳，后人将埋关羽之地称为“关陵”。陵区内保存有多处明、清两代碑刻，其中有清人集关羽语录的一块石碑，上刻有“读好书，听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碑文。在当阳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林彪之子林立果常去这个机场。一次来到关陵游览，看到此碑文，回去告诉了林彪。林彪受到启发，于是写下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毛课题词，刊在《毛主席语录》里，再版时又加上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一句。

本文我所说的刻碑，就是在石板上刻毛主席语录和林彪的手书题词。

在全国上上下下大力开展、学习、宣传毛主席语录活动的推动下，这项活动

很快便普及到农村。为了做到让毛泽东思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时间，大路旁，小路边，要道处，纷纷竖起了大小、各式各样的毛主席语录碑。大的用砖头砌成，刷上白石灰或白漆，再用红漆书写毛主席语录，有的还加了一个小盖顶。小的就直接用石板刻成阴文填上红漆，分外醒目。

我家本在农村，地属重庆石桥公社高庙大队四轮碑生产队（后又称为石桥镇高庙村四轮碑村小组）。看到路边竖立的语录碑，受到影响和启发，于是我也找来一块以前铺路但已废弃的石板，洗刷干净，刻上了仿宋体的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买来红漆填上，立在我家旁边的十字交叉路口，引来过往行人关注，村民们看了也说我的字写得很好。

我的字确实写得不错，这得感谢我的母亲。因我在小学毕业后整个暑期无作业可做，每天东跑西跑，到处游玩，有时还偷偷下水库洗澡，被母亲发现并遭到严厉批评。从此，母亲叫我呆在家里好好练字。她告诫我说，字是打门锤，练好了，以后到处都用得上。于是我便坐下来在客厅饭桌上练习写字，先练钢笔字，那时又没有字帖可参照，只好找来书报写印刷体，练仿宋体。手写累了，换毛笔写，在以后的假期里，我都坚持写毛笔字，就这样我的字有了一定的长进。没想到这次刻毛主席语录碑还真派上了用场。

在刻毛主席语录碑时，我先在纸上把要写的内容多练几遍，然后根据字数，才在石板上打长方格，最后用毛笔一笔一划工工正正地写下仿宋体的毛主席语录。

在刻字时，先从笔划的正中下手，把它刻成一条细沟。然后从笔划两边的边缘斜着往下和向中间凿，这样反复几次，使笔划呈阴文V字型。这是一项很细致很慢的工作，幸好我选的石板不是很硬，刻起来还比较顺利，刻完后再仔细检查，修整一遍，最后填上红色油漆，立在路边，一块醒目的语录碑就算完工了。

周围的村民看了我刻的语录碑后，认为我的字写得好，刻得也还可以，于是便找上门来：“王老六，给我刻块语录碑。”在我们王家我排行老六，也是老幺。生产队的大人们叫我王老六或王老幺，而年纪不大的村娃们则直呼我六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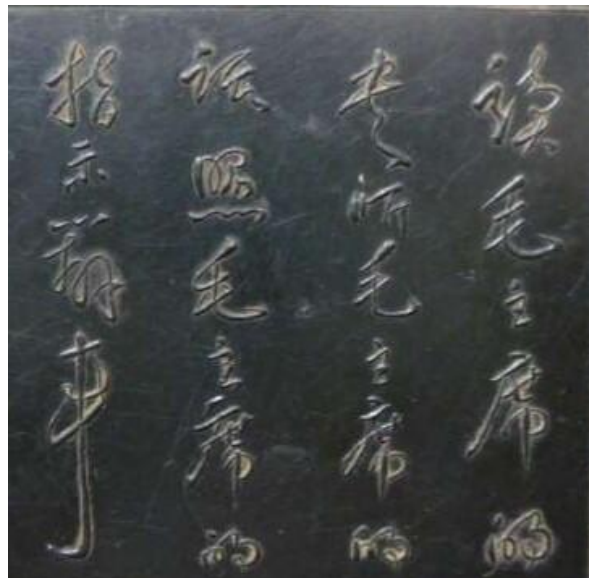
于是我带上红宝书和笔墨尺，还有榔头、錾子和油漆，便去给村民刻字碑。现在分析起来，应该是生产队向村民们提出了立碑要求，也是上级部门布置的一项政治任务。当然我有时间，也算有文化，自己还有这个兴趣，所以对于村民们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热心为他们刻毛主席语录碑。一个地方一刻就是一天或两天，村民们又不管饭，中午回自家吃了饭后，下午再去接着刻。

当初刻得最多的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

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等等。总之，尽量找字少的语录去刻。

在给村民们刻了几块碑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我先前刻的第一块语录碑，感觉不是很满意，于是便想重刻一块换下来。正好有村民来请我，想要刻一块语录碑，我就叫他把十字路口那块拿去，他自然很是高兴。

我又找来了比较大一点的青石板，刻下了林彪的手书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在刻这碑之前，我把林彪的手书练了一遍又一遍，几天下来，居然也维妙维肖，每个字都十分像林彪的手书了。于是，我也不用打格子了，提起笔悬空便写，一气呵成。在大石板上写下了林彪的题词三行大字后，本想再加上第四行“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但如果加上最后一句的话，字就会很小，只好作罢。

又花了三天时间，把它刻好，当我填上红色油漆之后，自己都觉得很满意，于是赶紧把它立在了交叉路口。

这块碑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便引来了一片赞美声，村民们都说写得好。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天下午，对面凉亭驻军的三位解放军叔叔路过此碑，见了上面的红色题词，几个人交口称赞，欣赏了许久才离去。

正当我准备放手大干，想为更多的村民们刻出更多更好的毛主席语录碑时，这项宣传活动突然被紧急叫停。后来只听人们悄悄议论说：不准刻了，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怎么能到处立碑？于是刻毛主席语录碑的事便戛然而止，已刻已立的石碑也很快消失，不见了踪影。

【口述历史】

文革中的重庆“八一红卫兵”调查

韩平藻

2017年2月8日采访

前言：2016年，重庆市第八中学校（文革时叫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附属中学

校，简称师专附中）文革老三届同学在任树林、曹登驹等校友主持下出版了《留给历史的记忆和思考》回忆录一书。笔者注意到其中郑前哨同学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我在重庆八一红卫兵的一段经历》（P438，选载于《昨天》第78期，2016年10月30日）。郑是该校初中67届4班学生，驻渝总字421部队（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驻沙坪坝区歇台子）军干子弟。文革期间参加重庆八一红卫兵组织，其叙述可谓弥补了重庆文革史的一段空白。

1966年8月18日得到中央公开宣传推广的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各地党政领导闻风而动迅速组织起官办的学生红卫兵组织。重庆市委文革领导小组凭借各大中专院校及普通中学党团机构系统逐级安排建立起了“重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不久又兼并了另一个规模较大的“重庆中学生红卫兵”，改称“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均由市委组织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并在《重庆日报》上大张旗鼓宣传报道。此后，社会各界纷纷响应中央号召，自发涌现出官办之外的各类群众组织，重庆地区自发成立最负盛名的重庆大学学生组织——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就是在与西南局、省市委当权派的直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性对立斗争中发展壮大并推向山城社会的。

而重庆“八一红卫兵”，则是重庆文革中的一个特殊“兵种”，属于官办还是自发组织？在重庆文革史的记述（不论是回忆还是史志记载）中此前均无人提及，郑前哨的回忆就显得弥足珍贵。

2017年2月8日，笔者受任树林之邀参加了他们重庆八中的一次同学聚会，健谈的郑前哨同学揭开了五十年前那段失落的重庆八一红卫兵组织的历史。

以下记录是根据郑前哨的口述记录整理。

问：重庆的“八一红卫兵”组织最初是如何启动的？成立的具体时间，地点、仪式，最初发起者，骨干参与者，组织分工任职等？成立前后有哪些活动？

郑：1966年8月重庆文革初期的学生运动兴起与我们八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有日记），在8月21日，我回学校在饭堂附近看见任树林等同学已经自发成立了叫“红旗兵团”的学生组织，我也报名参加，我看好的是红旗兵团的袖章，红旗两个字就是毛主席的字体，很漂亮。我就拉到肖国庆、陈国庆一起参加，但是袖章没有发到我头上，我就不安逸了（笑）。应该说，那时文革学生运动已经在学校发动起来了，就贴大字报啊！学生也就是耍起的，也没有课上了……

到了9月份，文革大串联已经起来了，我和班里的陈国庆、肖国庆、荆于金（班长）、孙逸民、宁新民等一帮同学9月4号找到学校的信安中老师开介绍信要串联去北京，这是当时大家的愿望，到北京后参加了9月15日的那次毛主席

检阅接见。

9月5号，我们一批八中的军干子弟乘10次京快列车出发去的北京，在车上，学校高66届3班的王思成同学宣读了由他写的组建八一红卫兵的倡议书，就叫签名，大家都签了，我们班上的几个同学都跟到我签了。记得有孙守民（高66届2班）、曹慧军（高66届3班，七军医大子弟）等同学。王思成父亲是歌乐山红军疗养院的，1927年参加革命，资格很老但是级别不高——因为没啥文化，好像定的级别是师职离休的，他的手下都有授衔中将的。王思成本人也是校排球队的主力，本身就是我们的偶像，当头头是自然的事。

到了北京，9月15日毛主席接见，9月18日我就回到了重庆，我当时也没有啥组织概念，我还是去找红旗兵团，还是没有发给我袖章。过了几天碰见王思成，他说八一红卫兵已经成立了。他告诉我9月17日在七医大游泳池旁边的一个会议室召集了成立八一红卫兵的筹备会。

这里有个特殊情况先要说一下。文革前，驻渝的军事机构和军事单位如：五十四军、重庆军分区，七所军事院校（通信兵工程学院、通信兵技术学校、通信兵雷达学校、后勤工程学院、第七军医大学、机要学校、炮兵学校）以及彭家花园军干所和歌乐山红军疗养院等单位，都在成都军区管辖之内，他们的子弟上小学都在鹅岭附近的八一小学校，所以大家都认识。上中学主要就在重庆一中、三中、八中（重师附中）和四十一中（巴蜀中学）这几所市内的名校。

我们八中的以军事院校和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的军队子弟居多，在几个班上特别集中，其他学校就都是个别分散的，但是大家也都认识而且原来也有个圈子。主要参加的如孙守民篮球打得好，王思成是排球班的，个子也高，丁凯洲是扣球手（父亲是总后渝办的，1955年授衔的少将），排球队在我们学校很有威望，都是我们的偶像，自然就有一批“子弟兵”跟到他们的。

那个时候，军队子弟和外地的也有认识和联系，因为父母战争年代也是战友彼此就认识，文革时都是以个人身份接触。我们知道北京已经成立了红卫兵，就是所谓老红卫兵，有“西纠、东纠”。其他地方也仿效，比如，沈阳的叫“红后代”，西安叫“红红——红色恐怖队”，很有名（西安的“红红”就是以“西军电”——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子弟为主成立的）。成都有个“7468部队”（不知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广州有个“思想兵”，这些都是军干子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

把重庆的各校军队干部子弟攒在一起的是刘志义，由他来负责把师专附中、一中等分散在市内各个中学的军队干部子弟穿针引线联络在一起，就在七医大游泳池旁边的会议室宣布成立的重庆八一红卫兵。

重庆八一红卫兵以两个学校为主，一个是我们八中（师专附中）院校子弟多，

一个就是一中，三中的子弟少，彭家花园（干休所）的也有一批子弟，四十一中主要是市委的干部子弟。然后，各校同学就领受任务分头回校发动，把同学组织起来成立分团一级的组织。

我们八中就是在教学楼开的成立大会，王思成召集大家开会时就专门谈了文革形势，各地都有军干子弟组建的红卫兵，重庆也要有。大家都一致赞成，是我校的孙守民同学起草的八一红卫兵成立宣言书。

军干子弟叫到一起的有二、三十个同学，宣布成立后都可以马上报名，大家情绪饱满还大吼大叫地呼口号——参加、参加……同时还成立了八一红卫兵的纠察队，由刘志义负责，曹慧军和叶焕清（高66届3班）起草了一个组织条例。叶焕清是东风船厂工人子弟，但是和王思成关系好，还有“猴子”——孙守民也不是军队子弟，但是和王思成观点一致，一起去的北京，算“铁杆”队员。以王思成、丁凯洲、刘志义为首，还有就是七医大的晋江红、韩启民和他的弟弟韩爱民，一中的一帮人组成纠察队。红卫兵袖章多“八一”两个字，我的编号很靠前，是0015号。我是活跃分子，不是头头，算骨干，因为我是排球班的，长得高，那时一般同学就只是1米6几，我已经1米74身高了。

问：建立“八一红卫兵”组织，文革当然是个大背景，其中有没有北京串联者介入鼓动？或者是部队影响和帮助成立？亦或是市委文革办公室的指示（你的回忆文章中似乎有组织联系——维持火车站秩序等）？

郑：重庆八一红卫兵联络站开始就放在我们八中，我们八一红卫兵成立的大背景就是文化革命运动，当然与各自的家庭背景也有关系，我前面已经说到了。重庆八一红卫兵组织成立完全是自发组织起来的，的确与重庆市委文革办公室和学校领导没得一点关系。

问：我们都知道重庆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由市委指示、市委文革办公室帮助安排组建成立起来的，如你所言，“八一红卫兵”不是受命组建，但是与市委、部队机关有无类似的组织关联？“八一红卫兵”与“思想兵”理论上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那么有没有组织联系或者说协同步调的行为，如串联、开会等联合行动？可不可以说“八一红卫兵”和“思想兵”在政治上（不是要造各级当权派领导的反）没有多大区别？“思想兵”参加了市委安排的“横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社会行动，“八一红卫兵”参加类似的活动没有？

郑：我们八一红卫兵是在成立后主动去联系的，最先就是参加市里统一组织的文革抄家行动，抄谁的家？是由公安局派出所提供的抄家名单。

我们八一红卫兵成立时动作很快，也不晓得王思成是从哪里搞来的钱？不晓

得是学校还是哪里给的钱（学校是可以给钱的），赶快去印袖章，当天晚上就搞好了，第二天就拿到了袖章。

肯定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和派出所给的抄家名单，百分之百我们是同派出所、居委会一起去抄的家。我们分配的名单共抄了十来家，抄了三天，以后的我就没有参加了。记得去抄的其中有一个是沙坪坝区最大的皮革资本家，还有一个是江姐（烈士江竹筠）的弟娃。他的名字我记不起了，记得他住在石桥铺传染病医院对面半坡上。这个人是江姐的亲弟娃，名字记不起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住的老屋一面墙上挂的就是一幅江姐绣红旗的像（画），一间房里两张单人铺收拾得很干净。同房间的另一个人没见到，但居委会事前介绍说那个人成分很好。灯光还是用的白炽灯或是日光灯，文人一样的感觉，他就是一张铺，床下只有一个箱子（不是皮箱），墙上一张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穷得不得了，啥东西都没得，啥也没有抄到。派出所说他是江竹筠的弟弟，所以我们对他还算客气，让他坐在床边上，他也不敢说话，我们指着他骂也没有打他。

他说，1947年国民党抓壮丁把他抓到台湾当兵，1950年把他空投到贵州，一降下来就遭逮到了。原本对特务的处罚很重，不知怎么查到他是江竹筠的弟弟，就没有判他的刑，网开一面把他放了。把他安排到哪个单位记不起了。到五七年又打成了右派，他是因右派问题才被我们抄的家，这都是派出所、居委会事前就明确指认了的。

我们指责他，你姐姐是共产党你为啥参加国民党？他讲，他是在街上摆地摊时被抓的壮丁，身不由己被押到台湾当兵培训两年，空投下来也没有犯事……你为什么又讲反动言论成了右派？他说，打右派时，我也没说过啥子反动言论，也不晓得哪个就遭起了！

他住处的斜对面有一家是个国民党的什么参谋长，下面一家是一个地主，我集中参加的就是抄这三家。抄家时就学着《地道战》拿个铁棍地上也戳一戳，发现不对的声音就挖地，挖一天都不觉得累。进门还不坐地主的床，不喝地主家的水。二十中有两个学生拿了抄家的十块钱揣在口袋头，吃了碗小面，被晓得了立马就把他两个开除出红卫兵。记得地主把长袖衣服几件穿在身上，热得一身是汗，怕（衣服）被抄走了。我们叫他脱了，还是抄走了。金条是抄到了的，是从地主和参谋长家抄到的。先登记让他们签字，当天晚上就集中交到派出所，然后由我们八一红卫兵押送到上清寺工业展览馆，当时全市的文革抄家物资都统一保存到那里。直到这时，还是和市委文革办公室没得直接的组织联系。

就在抄家后，校文革小组通知我们八一红卫兵到市委去开会，开红卫兵的联络会。王思成就叫我和刘志义去参加了，是在雾都宾馆，开会就是分钱，叫开会的报你那个组织有多少人数，就按人数发物资。我就报了700多人，实际我们只

有 100 多人!“吃空饷”就分得多喽!(笑)给了我们 170 块钱,觉得好大一笔钱哦!我们也没有随使用,都做了账的。运动后期王思成还被查了账的。另外有两部油印机,一个刻蜡纸的钢板,印传单的书写纸,还有两辆自行车。

具体讲,最先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通知开会,市里就晓得我们八一红卫兵不只是哪个学校的,而是全市性的一个中学生组织,从此开始与市委建立起了联系。不过也没有直接领受布置任务,对于如何搞文革也没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但是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八一红卫兵成员有一种优越感,我内心就有个十分明确的想法:这个江山是我们父辈打下来的,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保卫它。这个江山我们是有份的。参加八一红卫兵的人绝大多数都抱有这个思想,保卫党保卫毛主席当然义不容辞。但是对于斗老师、斗走资派我们是不感兴趣的,而且某种程度上是反感的。我们军队干部子弟自成一伙,看不起别的人,对于工农子弟看得起,跟我们比还是该排到我们后头。谭立夫的血统论思想在我们的脑子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八一红卫兵主要是参加了横扫“四旧”,烧东西和横扫“牛鬼蛇神”,抄家行动我们是积极的。抄家中我们毁坏的东西很少,主要是王思成(头头)思维正统,一点也不乱来。

抄家之后(1966 年 11 月),八一红卫兵将总部搬到重庆市八一小学校内,总共有 300 多人,加上红小兵,人数达到 700 多人,经常参加总部活动的也有 100 多人。这个时候市里通知开会,应该是丁凯洲去申请任务,市里就派我们去守卫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因为那时大串联已经是高潮,火车站秩序不能乱,是丁凯洲和韩启民负责接受的任务。八一红卫兵的家庭条件好,全都有自行车,一色的黄军装,还有腰间系的皮带——皮带还有讲究,我系的是校官牛皮带,尉官是人造革的,穿的军装校官是黄呢的,尉官是卡其布的。我们八一红卫兵绝大多数是校官以上。给人感觉很整齐,真像军人一样。我们在一中学校集中了一百多人,在教室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市里派了两部卡车把我们拉到火车站,就住在菜园坝小学教学楼,打地铺,就这样维持火车站秩序到 1966 年 12 月。

八一红卫兵在文革中只做了几件事,第一抄家,第二守卫火车站,第三占据市里电车站、汽车站做文革宣传。凡是看见穿黄军装的大批红卫兵在沿线车站的就是我们八一红卫兵的学生(包括八一红小兵)。重大八一五与我们没有联系,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说法,既没有指责我们是保皇派(思想兵),也没有认同我们是造反派。我们在抄完家之后就离开学校(八中)搬到重庆八一小学校去了(鹅岭公园附近)。我们与学校的文革运动也没得交集,与学校的造反组织“红旗兵团”彼此都不了解也没有矛盾,后来学校反到底派的倒有许多铁杆还是原八一红卫兵的。我们与学校的“思想兵”也没得联系。我们相当独立,自成一体,因为八一红卫兵的同学之间从小学、中学都在一起,连父母都认识。

到了 1966 年底大串联快要结束时，我们守卫火车站（维持秩序）的工作做得好，火车站就给了我们一本免票乘车证，盖好章的，从重庆出发一律免费，全部是卧铺。王思成掌握。大家也想串联也不想继续守了。我和王思成、刘守义没有走，就留下来筹建八一红卫兵总部的工作。看中八一小学是个独立的院子，原本是住宿学校，连被子都不用带，还有食堂，军干子弟家庭条件都比较好，每人月交 10 元钱伙食费，吃住在一起就没得问题。我们把总部建在八一小学是给市委文革办公室汇报了的，是我去汇报的。还分配给 500 块钱，当时简直是一笔巨款啊！还给了一辆摩托车、两部高速油印机和很多纸张。到大坪摩托车俱乐部就派了一部捷克“加瓦”牌摩托车骑回总部。后来大坪中学的乔光骑车时这辆车爆炸他就被炸死了。这 500 块钱就买了一个组装的扩音器、两个喇叭，加上小学原有的两个，又在一个晚上偷了不晓得是哪个造反派的喇叭，把电线割断背起就跑，我还去了的……总共就有六个 25W 的喇叭，对着两路口方向吼，我们还过去试听，效果很好。

1966 年 12 月，八一红卫兵总部建立就绪后还搞了一次民主选举，选出领导人一、二、三号勤务员。结果七医大的（子弟）韩启民遭选脱了，晋江红被选上来了。这样就是王思成、丁凯洲、晋江红三个人当头头。

这时，文革已经轰轰烈烈搞起来了，七医大的，总字 421 部队（驻歇台子）政治部的，都派人来找我们说，现在各个学校这么乱，家属子弟娃儿不安份，半大不小十二三岁的蠢蠢欲动，你们这儿还好，还是半军事化，本来这些娃儿就是在八一小学读住读，文革放假回家没人管，你们就把他们给管起来，不让他们到社会上去乱来。这样就增加了一百多两百人。学校领导本来互相认识，都是渝办代管的军人，没人敢动他们，学校很稳定，真是文革中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但是有一条，五十四军的干部子弟没有参加八一红卫兵，他们参加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要是思想兵的纠察总队六中队。四十一中的纠察六中队由思想兵的骨干组织起来的，打、砸、抢，抄家呀，相当于“冲锋队”，就是他们干的。我们院（421 部队）政委的女儿、老王部长的女儿全参加的六中队。思想兵政委刘桂兰，纠察总队长孟军两个都是干部子女，一般队员就都是四十一中的中学生，地方干部子女居多。四十一中也是八一红卫兵联系多的根据地之一，主要是个人之间来往比较多，并不是组织之间的往来。后来，刘桂兰、孟军她们两个率先宣布造反，一下子思想兵就垮了。我是在押送抄家物资到上清寺工业展览馆时认识孟军的。八一红卫兵的曹慧军跟孟军关系好，大家还开玩笑说他们是在耍朋友哩。

我们八一红卫兵同思想兵对文革的态度和政治观念是一致的，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这些口号和行动是心怀不满的。所以，我们的宣传活动就是针对这些标语口号，比如我们就刷标语，以什么“庆祝重庆解放十七周年”大口

号之类的将造反派的那些口号、标语覆盖。我们是反对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这是肯定的。记得林园的412（通信兵工程学院，军级单位，驻歌乐山林园）的造反派要斗老干部时，陈小明（412的军干子弟）为首就把自己的父亲和其他干部集中到自家小院的楼上，十多个八一红卫兵守在院子里，不准军校学员冲进来揪斗。

除去抄家，八一红卫兵也几乎没有介入社会上的运动。记得当时有一件事情，歌乐山红军疗养院子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朱光辉（音）和唐干渝（大学生，唐的父亲是总后渝办副主任），他们串联来重庆，依靠的是思想兵和工人纠察队（保守派），本来大家就都要得好谈得拢，他们大学生总想做大事，于是就想动员我们中学生和他们联合在一起，王思成不是很赞成，觉得我们何必靠别个，独立行动多好，联合就没有搞成。

1966年12月4号，重庆发生了“一二·四事件”，那次大田湾体育场（保守派）开大会，我们没有参加，传出打死人的消息，八一红卫兵还是组织了十几二十人穿着黄军装骑着自行车去兜了一圈，我看到街头上乱糟糟的，没有人阻拦也没有人围攻，观察了一下，没有参与，我们就离开了。所以对这件事也没得立场，但是对文革打倒领导是不安逸的。

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夺权就要开始了，保守派愈发被动，有传言造反派要抄思想兵在鹅岭公园的总部，思想兵的头头可能是找了丁凯洲同意，他们把东西转移到八一小学来存放，拉了两卡车，就放在教学楼里，记得有大米白面和猪肉，正好给我们改善伙食。哪晓得这就引火烧身。1967年1月23日晚上，造反派就上鹅岭，把思想兵总部给抄了，别人早有准备也掌握得很清楚，思想兵的材料转移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根本没把八一红卫兵放在眼里，大坪汽车修造厂、织造厂的造反军冲进八一小学，不但大打出手（我被打成重伤），把总部抄了，还把我们抓到公安局关起来，一直到重庆发生了“一月夺权”后才在父辈们出面干预下把我们放出来。

那个时候和八一五派也没得联系，只是运动初期在学校活动，离开学校后就到火车站去了，所以与学校文革没得交集。到火车站时就在八一小学建总部，1967年初总部被砸（1月23日），坚持了个把月就又回到本校，住在饭堂。这个时候就“分裂”了——说“解体”更准确。这样一来，大家就各自返回学校了。紧接着就发生了“二月镇反”，这就不一样了，我们当然恨造反军，认定他们成分不纯、邪门歪道，就是敌人，本来“二月镇反”就是以军队主导加上“公、检、法”一起搞的，渝办（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的政委丁国文少将代表（除五十四军以外的）所有驻渝军队单位，领导介入地方“支左”。丁国文的女儿、儿子又都是我们八一红卫兵的，还一同被造反军抓过，打得很惨，因此我们被丁国文招呼派

到大坪地区各个派出所去，相当于今天的“协警”，参加了“二月镇反”整治反军。

随着文革演变成群众组织的内斗，武斗兴起，八一红卫兵就退出这场运动了，没有介入武斗。王思成给我说是家里面干预了，各个家长专门给他打电话，加上他的年龄稍大些，在同学的心目中很有威信，八一红卫兵文革中没有做太出格的事与他稳重这一点有关系。还有就是军队上层已有明确通知，特别指出军队干部的子弟不要参加地方上的文革运动，干部要带头，不要介入，要保持军队的稳定。所以八一红卫兵就没有再参与其中。

王思成后来在重庆大学保卫处领导岗位上工作直至退休。

后记：郑前哨的叙述比较清楚地表明，重庆八一红卫兵是自发组织成立的，成立起来后接受过来自市委文革办公室等安排的任务，组织存在时间很短，从成立到解散历时不到半年。

最值得庆幸的是，即便在文革最狂热的运动前期，重庆八一红卫兵并没有制造出类似北京“红八月”那样的伤天害理的大事件。当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发生惊动全国的“一二·四事件”时，他们也仅仅是作为旁观者而并未介入其中，这当然得益于有一个成熟而理智的头头王思成。同首都老红卫兵、西安红卫队之类“血缘”相同的组织比起来，重庆八一红卫兵在严酷的重庆文革中既没有让他人失去生命欠下血债，也没有因肆意残害平民而遭人痛恨……文革是天下的大不幸，重庆的八一红卫兵能这样不留骂名“全身而退”，也算得上小幸吧。

2019/3/6 完稿

【史林一叶】

重庆市北碚区抄家物资的管理和早期退还片断

庞国义

文革前的北碚区是重庆市的一个远郊区，距重庆市政府所在地约五十公里。这里山明水澈，风景秀丽，著名的缙云山和北温泉就在这里。区域内有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四川外语学院三所高校，有重庆市四大煤矿之一的天府煤矿，还有多个正在搬迁的大三线内迁企业，1966年全区人口二十八万。

1966年5月，以中共四川省委名义的重庆市社教工作团三千多人，进驻北碚区城乡各级机关、区属企事业单位及农村社队，全面开展“四清”运动。在当

月的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全国进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北碚区社教工作团几乎包揽和替代了区委的政治思想工作内容，包括天怨人怒的抄家活动。

抄家活动由北碚区社教分团发起

据《北碚区大事记》（北碚区地方志办公室编，2011年12月第一版，准印证号：渝内047613）1966年记载：

8月23日，北碚社教分团文教工作队发出《关于缙云山风景区和北泉公园文物古迹清理情况的报告》，25日又发出《关于清查收藏收缴反动封建书刊及其他坏书的通知》，提出缙云山、北泉等寺庙的大小泥塑神像均应彻底捣毁。随后，9至10月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查抄了所谓“黑五类”、“牛鬼蛇神”的家1240户。据统计，收缴了各种书籍5万多册，各种画卷5000多张，砸毁神像2000多个，收缴黄金、白银140多两，银元3000多个，首饰1200多件，现金10多万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党的政策进行了清退工作。据清退时统计，查抄各种物资总值439560元，粮票35342斤（1972年至1979年已大部清退，1985年基本退完）。缙云山、北温泉等处石刻、雕塑遭到严重破坏。3个月中，因恐惧自杀者达26人。

北碚区的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较重庆市其他各区来说是最完善的，这段短短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

一、摧毁庙宇古迹泥塑神像和抄家工作是当时执掌权力的部门发出文件后才展开的，时间在北京市大规模“破四旧”和林彪“八一八”支持“破四旧”的讲话之后。

二、抄家的目的是为了“清查收藏收缴反动封建书刊及其他坏书”，而“战果”却包括了黄金、白银和现金。

三、破四旧运动引起了恐惧，死了26人，全部是自杀。

四、清退抄家物资的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

这段话中抄家物资的清退时间表达不严谨，文中所说的1972~1979年由官方主持了清退工作，其中的1972年不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而是在文革中。

重庆市藏书家周巧熙先生每周在旧书市场海淘，得到一批有关部门清理扔掉的北碚区文革时期的抄家资料，笔者有幸一睹“芳颜”，见识了那波历史大潮中的几朵浪花，惊异地发现北碚区的抄家物资清退工作，早在1966年10月保守组

织存在时期和 1967 年初的造反派掌权时，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岁月里，在一个国家机构健全的国家内，在和平环境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凭一纸“北碚社教分团文教工作队”的文件，以“清查收藏收缴反动封建书刊及其他坏书”为名，就对区内一些家庭进行抄家，在今天简直是匪夷所思。

1966 年的所谓“红八月”，因毛泽东的支持，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中央首长和文革小组要员的鼓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下，全国各地掀起一波又一波排山倒海汹涌澎湃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巨浪，政治大气候使弹丸之地的北碚区社教工作团不得不紧跟“革命”形势，义无反顾地卷入这个浪潮之中。他们打着“清查收藏收缴反动封建书刊及其他坏书”的旗号，利用官办的“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赤卫军），对那些毫无招架之力的管制对象“黑五类”分子以及一些无辜群众的家庭，进行肆无忌惮的抄家，而查抄出来的东西，仅有少量的所谓“坏书”。我见过我家附近的街坊谢××被抄家时，墙上张贴多年的一幅“三英战吕布”年画，几本破旧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连环画都被当作封资修的坏书画收缴了。抄家活动中所抄的大量却是钱物、衣裤等生活必需品，给这些家庭大小成员以精神上的沉重打击，造成生活上的严重困难。

北碚区抄家物资管理办法

为使抄家活动系统化、规范化、合法化，事后由“北碚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物资代管处”制定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搜查物资管理办法》，以下是这个《管理办法》的全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搜查物资管理办法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荡漾着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成了敢说、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的先锋！他们，造了资产阶级的反，抄了“黑五类”的家，革了混蛋们的命，把那些老吸血鬼，寄生虫剥削劳动人民来的金银财宝和妄图实行阶级报复的杀人凶器……都抄了出来，红卫兵为这场大革命立下了功勋！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昔日以剥削劳动人民血汗来供那些不劳而食的混蛋挥霍的物资，今天将成为人民一笔新的财富。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把红卫兵

交来的物资收好管好。为此，特提出以下管理办法：

一、为了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我区成立“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物资代管处”，负责研究和安排文化革命中红卫兵抄家的物资的代管工作的有关事宜。

二、凡红卫兵搜查来的物资，一律由所在街道办事处负责代管。经有关部门研究，黄金、白银由办事处集中后转送人民银行区办保存。现金、存款、公债转送当地人民银行储蓄所保存。粮票转送当地粮站保存。手表、玉器、珠宝等贵重物资，由办事处自行装箱、加锁贴上封条送当地人民银行代保管。其余各种物资，仍存放各街道办事处就地保管。请各街道办事处，根据物资多寡情况，指定一至二位政治可靠，经济清楚，责任心强的同志具体负责实物的保管和经过批准后退出现物的工作。

三、凡属代管的一切物资，任何人一律不准擅自动用，或携出库房。如确因集体办公需要，必须经过上级有关领导批准，并签注借据后，方能取用。对已贴上封条封闭的物资，任何人不准随意撕毁和私自启封。否则发生短缺情况概由其本人负责。

四、凡是由街道办事处集中转入人民银行、粮站的现金、存款、公债等物资、粮票，应出具正式收据。如经过有关部门批准需要退出部分时，由街道办事处填制专用凭证，经核对印鉴无误后，应及时退给，不准刁难。

凡是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或手续不齐全者，一律不得退还任何物资。经过批准退出的物资，保管人员应将本人申请或者有关退物凭证妥为保存，并及时做好记载，防止丢失和错乱。

五、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各街道办事处应主动配合派出所，在当地社教工作队（组）及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1）严防阶级敌人乘机破坏。各地应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除要求保管人员加强革命责任感外，并组织安排一定的力量，实行值班制度，防止盗窃事件发生。

（2）防火。凡是堆存物资的库房，不准存放爆炸、易燃物品。非值班及有关工作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库房。不论何人，一律不得在堆放物资的库房抽烟。

（3）防霉变。凡是潮湿的地方，必须在下面垫塞砖头和木块。房屋漏雨的地方，街道办事处负责，应及时修理，防止物资发霉变质造成损失。

（4）防虫蛀鼠伤。凡是容易被虫蛀及鼠咬的东西，必须施放杀虫杀鼠药剂。

六、加强检查制度。区代管处不定期派员巡回检查，尤其是各街道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应随时进行检查，如有霉变和虫蛀鼠伤及其他不安全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并将情况向区联系。

北碚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物资代管处（印）

1966 年 11 月 1 日

这个“北碚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物资代管处”显然是一个官办机构，是北碚区社教工作团组建的，它可以安排区辖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人民银行区办和粮站，负责处理文化革命中红卫兵抄家的物资的代管工作的有关事宜。

可惜好景不长，两个月后，夺权风暴由上海刮到重庆，1967 年 2 月份以后，这个“代管处”的工作由造反派掌权的“区革委”替代。

抄家活动抄了些什么东西

除了《北碚区大事记》里记载的那些“抄家战果”之外，还从抄家对象家里抄走了些什么东西呢？又是怎么处理的呢？笔者从周巧熙先生从旧货市场得到的资料中了解到一些真相。

这是一份抄家物资清单，被抄家者是朝阳运输社的张洪昌，家住解放路 43 号。清单上列出的被抄物资有领带、被面、枕头、纱布、上衣、裤子、背心、围巾、木箱、绸子、毛衣、棉衣等，均是日常生活用品。笔者所见的其他几份清单也大同小异。

这些“黑五类”“牛鬼蛇神”家庭条件本来就差，被抄后更是一片狼藉空空如也，只剩一些简陋锅灶，烂盆破碗。由于抄家时间是在天气炎热的夏季，除了身上穿的，可谓“一网打尽”。随着天气一天天变凉，他们雪上加霜，逐渐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于是一些家庭不得不冒大不韪发出呼号，恳请当权者退还被抄的部分衣物，以御寒保命度过即将来临的严冬。

保守组织最早的退还抄家物资行动

被抄家群众在秋冬季节来临之际，纷纷写出书面申请，要求退还抄家物资。以下是北碚区歇马场（文革时改为“红岩场”）邮递员陈仪芝在十一天内连写的三份“申请书”，内容为索要“不属四旧”且“现急需用”的部分棉被盖、棉衣、粮票等物品。他四处奔波，并承诺“其余不急需用待以后解决都同意”。

下面按照原文录入“申请书”内容（抄录者注：文中句子不通处及错别字均照录，以下同）。

申请书 1

申请书

申请人陈仪芝，工作单位红岩场邮电支局，负邮递员工作任农村段。我家住红旗街104号后面，继母万光明，媳妇江国芬等六口人。

申请理由1966年10月5号被抄家，破四旧立四新，由于过去觉悟很低，家中有部分四旧东西被红卫兵同学，计杨正学，郭世容领导几个红卫兵小将清出拿去了，我很欢迎他们的革命行动。

但是有许多东西不属四旧的，也被红卫兵同志拿去了，现以有九天未见处理，也未见归还，特别是近日来天气渐渐冷起来了，老幼共计六口人的被盖、棉衣、统绒衣、换洗衣、粮票165斤多，本人的毛线下载，蓝布衣等，都由红卫兵同学清去了，还有旧钟一只也拿去了，每天时间都无法掌握影响工作，现急需用的部

申请书

申请人，陈仪芝，工作单位红岩场邮电支局负邮递员工作任农村段，我家住红旗街104号后面，继母万光明，媳妇江国芬等六口人。

申请理由1966年10月5号被抄家，破四旧立四新，由于过去觉悟很低，家中有部份四旧东西被红卫兵同学，计杨正学，郭世容领导几个红卫兵小将清出拿去了，我很欢迎的他们的革命行动。

但是有许多东西不属四旧的，也被红卫兵同志拿去了，现以有九天未见处理，也未见归还，特别是近日来天气渐渐冷起来了，老幼共计六口人，的被盖、棉衣、统绒衣、换洗衣、粮票165斤多，本人的毛线下载，蓝布衣等，都由红卫兵同学清去了，还有旧钟一只也拿去了，每天时间都无法掌握影响工作，现急需用的部份东西，如棉被盖、棉衣、粮票，现需用急，特此申请组织设法要求联系解决部份，其余不急需用待以后解决都同意。

1. 棉被盖六人需三床，拿去的五床
2. 粮票 ... 部份 拿去了 165斤半
3. 小钟 因无法掌握时间影响工作
4. 媳妇穿的棉衣、换洗衣部份
5. 本人毛线下载一套，因我无棉衣、无棉裤，也无夹裤。

特此申请组织设法联系解决为感

说明：本人是组织上在红岩场镇租用二床至晚（三角）

陈仪芝 1966年10月15号申请

分东西，如棉被盖、棉衣、粮票、现急需用，特此申请组织设法要求联系解决部分，其余不急需用待以后解决都同意。

1. 棉被盖六人需三床（拿去的五床），
2. 粮票六人部分，拿去了165斤半，

3. 小钟 因无法掌握时间影响工作，
 4. 媳妇穿的棉衣、换洗衣部分，
 5. 本人毛线下装一条，因我无棉衣、无棉裤，也无夹裤，
- 特此申请组织设法联系解决为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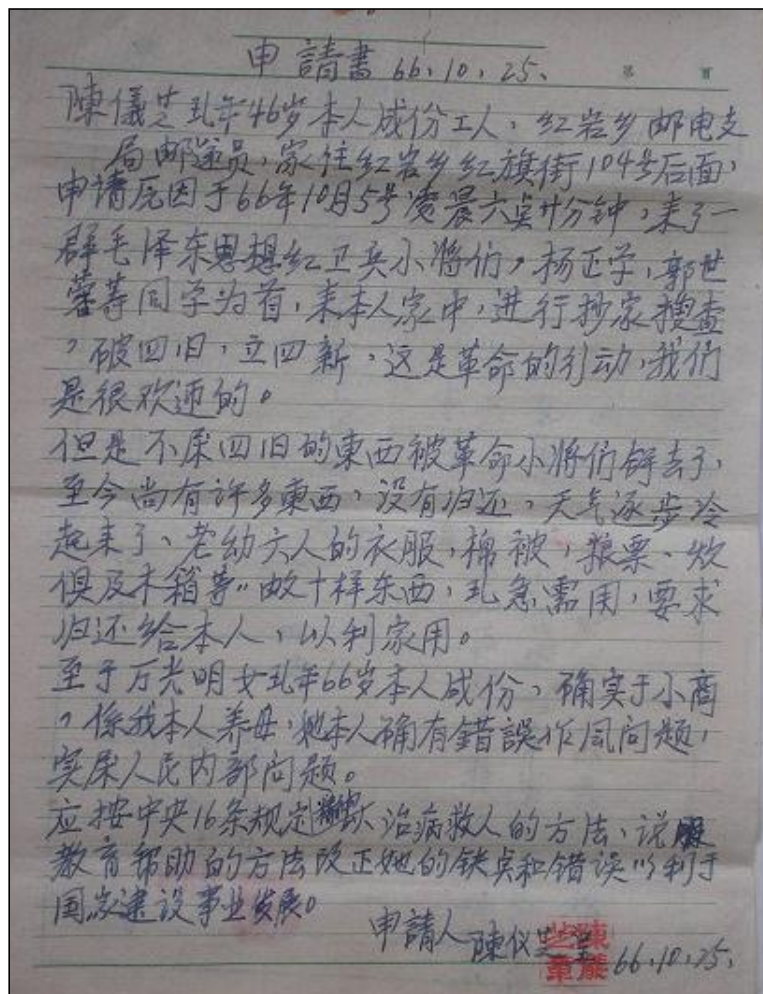
陈仪芝(印) 于 66 年 10 月 15 号申请

(说明：现是组织上在红岩旅馆租用二床每晚三角)

申请书 2

申请书 66. 10. 25

陈仪芝，现年 46 岁，本人成分工人，红岩乡邮电支局邮递员，家住红岩乡



紅旗街 104 号后面，申请原因 1966 年 10 月 5 号凌晨六点廿分钟，来了一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小将们，杨正学，郭世容等同学为首，来本人家中，进行抄家搜查，破四旧，立四新，这是革命的行动，我们是很欢迎的。

但是不属四旧的东西被红卫兵小将们拿去了，至今尚有许多东西，没有归还，天气逐步冷起来了，老幼六人的衣服、棉被、粮票、炊具及木箱等数十样东西，现急需用，要求归还给本人，以利家用。

用。

至于万光明，女，现年 66 岁，本人成分确实于小商，系我本人养母，她本

人确有错误作风问题，实属人民内部问题。

应按中央 16 条规定精神，以治病救人的方法，说服教育帮助的方法改正她的缺点和错误以利于国家建设事业发展。

申请人陈仪芝呈(印) 66. 10. 25.

申请书 3

罗所长同志：

你好，关于本人家中于 66 年 10 月 5 号被革命小将搜查抄家的事情，前次我已向所长说明了经过过程，根据所长指导，我今写好申请书，特交我孩子陈启洪，给你送来，请你劳神协助解决，为盼。

有关本人养父和养母的一些生活作风的缺点和错误问题，我已向所长同志说明过，我养父陈必有，是 1938 年 11 月 4 日染病，6 号病故，他的田土是 1934 年间全部卖尽，他生前所干的事情，只是干过邮政代办所售邮票和托收信件，确实未当过局长职务，他代售邮票每月应得酬金 3 元。

养母，万光明，女，年 66 岁，本人成分贫农，个人成分小商。解放前后，

罗所长同志
你好，关于本人家中于 66 年 10 月 5 号被革命
小将搜查抄家的事情，前次我已向所长说
明了经过过程，根据
所长指导，我今写好申请书，特交我孩子
陈启洪，给你送来，请你劳神协助解决
，为盼
有关本人养父和养母的一些生活作风的
缺点和错误问题，我已向所长同志说明
过，我养父陈必有，是 1938 年 11 月 4 日染病，
6 号病故，他的田土是 1934 年间全部卖尽
，他生前所干的事情，只是干过邮政代办
所代售邮票和托收信件，确实未当过局长职
务，他代售邮票每月应得酬金 3 元。
养母，万光明，女，年 66 岁，本人成分贫农，个人成分小商
解放前后，在生活作风上有严重缺点和错误
问题，实属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方法，以说服
教育批评的办法去解决改造她的旧思想，
邮递员 陈仪芝 66.10.26

在生活作风上有严重缺点和错误问题，实属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方法，以说服教育批评的办法解决改造她的旧思想。

邮递员 陈仪芝 66.10.26

前两份“申请书”中，陈仪芝一边诉苦一边言不由衷地表示欢迎抄家的“革命行动”，就像被小偷进屋偷走东西，还得表扬偷得正确，必须给予充分肯定一样。这就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语境。第二份申请书中提到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当时重庆市官方组建的御用红卫兵组织。

第三份“申请书”是写给派出所“罗所长”个人的，此前陈仪芝已经找过罗所长，可能还不止一次。从“申请书”中看出，陈否定了养父当过邮政“局长”一事，肯定了被抄家的原因是养母万光明解放前后的“作风问题”引起的。且不说万光明的“作风问题”与抄家有多大联系，而且估计许多事情是发生在解放前，难道不应该把罪责算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头上吗？现而今万光明已经66岁了，她还能出现多大的“作风问题”？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威胁”？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不可理喻的事情，在文革期间的中国大地上的的确确发生了。

更难能可贵而又让人感叹的是陈仪芝提出对养母的处理办法，“应按中央16条规定精神，以治病救人的方法，说服教育帮助的方法改正她的缺点和错误以利于国家建设事业发展。”“在生活作风上有严重缺点和错误问题，实属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方法，以说服教育批评的办法解决改造她的旧思想。”

陈仪芝的要求被批准没有？这里没有发现相关资料，无法证实。

其它材料说明，北碚区当时的执政者是采纳了这部分群众的意见的。

以下是北碚区向东小学为该校教师汪兴烈出具的证明，原文照录。

兹证明 73号

我校教师汪兴烈在我校工作，冬季寒衣和本人用品放置家里，现因急需，请你分部给予证明，到红星派出所领用。

此致

重庆市大中小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分部

重庆市北碚区向东小学（印）

十二月十六日

大衣一件，皮短大衣一件，加克二件，凡尔丁裤子两条，胶鞋一双，长筒胶鞋一双，棉毛衫二件，棉毛裤子一条，哗叽上装一件，毛线一件，共十三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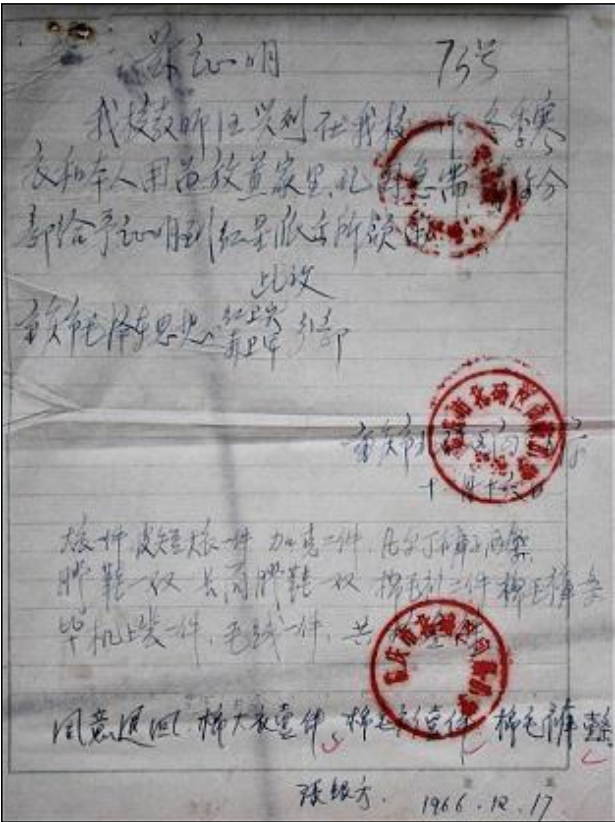
重庆市北碚区向东小学（印）

同意退回棉大衣壹件，棉毛衫壹件，棉毛裤壹条

张银方 1966. 12. 17

此件说明，汪兴烈要求退还的13件过冬衣裤的要求，没有完全得到满足，象征性地退了3件，大多数未能退回。

从退还给汪兴烈的“照顾过冬急需物资批准退还清单”（见下图）可以看出，由于此类要求甚多，引起了当局的重视而且采取了具体的统一行动。重庆市北碚区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碚分部专门油印了较为规范的退还



照顾过冬急需物资批准退还清单		编号: 27	
姓名	汪兴烈	住址	向东小学
退还物资	棉大衣壹件, 棉毛衫壹件, 棉毛裤壹条		
备注	在红卫兵取东西, 清单是汪兴烈清给数字		
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碚分部		经手人	张银方
		1966年12月17日	

清单，实施了“急需物资”的退还。从编号 27 的这份清单看来，的确退还了一部分群众过冬的少部分衣裤。备注栏里写的“在红星取东西”的“红星”即上文说的“红星派出所”。

造反派掌权后的退还抄家物资活动

1967年“一月夺权”后，市内各行政区和单位普遍建立了以造反派为主的临时权力机构，政治风向大变。于是，几个月前被抄家的人们利用自己造反组织成员的身份，纷纷依靠造反派组织，要求索回被抄物资。

先看一份红岩机器厂“八·三一”战斗团为本团负责人杨丙麟索回被抄物资的材料：

兹有我厂革命职工杨丙麟同志前来联系，在去年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抄家拿去的衣物等东西，经现在查明，这个所谓抄家，是有（由）北碚区委肖志、李明先等人，北碚公安局与我厂四清工作团桑林等人，一手策划泡（炮）制的。其目的主要是以借抄家为名，行打击8·31战斗团之实，因当时杨是8·31临时负责人，所以他们会这样干，现在桑林等人也认责，是他们一手策划搞的，事情现在基本澄清，故所以前来联系，被抄去的东西，准备取回，希给予解决为荷。

此致

敬礼

上述情况确实，本团责令原工作团桑林及队长晏治华追回有关杨丙麟抄家的东西。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岩机器厂八·三一战斗团团部委员会（公章）

1967年2月26

以上情况 属实。

桑林

1967.2.26

只退杨本人被抄东西

其他东西暂不退。

重庆市北碚区革命造反派临时委员会办公室（公章）

2.26

已退回以上物资，差大小皮包3个

刘金娣

1967.2.27日

文中提到“肖志”是重庆市社教工作团北碚分团团长，“李明先”是北碚区委副书记，此时他们已经失势，可以任意被指控，以前他们整人，现在也落到被人整的地步。红岩机器厂“八·三一”战斗团团部委员会出具公章，签上“责令原工作团桑林及队长晏治华追回有关杨丙麟抄家的东西”字样，语气强硬，今非昔比，真是“风水轮流转”。

当时四清工作队负责人桑林（重庆市总工会副主席）乖乖地写上“以上情况属实”、并留下亲笔签名。

但具有审批大权的“重庆市北碚区革命造反派临时委员会”办公室签注的意见是：“只退杨本人被抄东西，其他东西暂不退。”因此退还并不彻底，仍留有尾巴。究竟退了哪些东西？经办人刘金娣注明“差大小皮包3个”。留下哪些东西未退？暂无详细资料考证。

再看红卫兵小学（原歇马小学）教师曾国纲（已经加入“红色造反军”）的退还申请。

材料一

申请书

今接四清工作组通知：将本月二十七日，由48中红卫兵暂时收存的伍拾伍元人民币取回，便于家中生活开支。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党对职工生活的莫大关心，我和我的家属甚为感激。故向支部申请将该款领回。

此呈

红岩小教支部（重庆市北碚区歇马地区小学校支部委员会公章）

转呈

四清工作组

申请人

曾国纲

1966. 10. 30.

同意 1966年10月31日 张庆珍签

材料二

申请书

天气转寒，需要棉被和经常换洗之裤，请求给予照顾。将前交在红岩街道办事处
的棉絮式床，被面式张，蓝色长裤男女各一条，以及手表壹只（因工作的需
要），请组织批准领回。

此呈

红岩小教支部

转呈

四清工作组

申请人

曾国纲

1966. 11. 15.

以上情况属实，请工农兵战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队处理。

红岩学点工作组张庆珍 1966. 11. 15. 张庆珍（签字）

同意工作组的意见（重庆市北碚区歇马地区小学校支部委员会公章）

材料三

过，共退 19 人（注：这是经办人的批注说明）

67. 4. 5.

我红色造反军成员曾国纲同志系本学点红卫兵小学教师，父是店员，母是小
土地出租，个人成分是学生，全家共捌人。因在去年 10 月 27 日下午被抄家，其
原因是成份不清。经查实，该同志解放前居住的生产队有证明交到红岩学点小教
支部，实属错抄，故同意所抄物资退还本人。其物资如下：

收音机 壹部 围巾 三条 √小花瓶 一个
√字帖旧书 三十三本 毛巾 二条 铜元 二个
√笔记本 三本 方围巾 一条 √银元 一个
√毛主席像 二张 枕头面 一块 小铜钱 二个
√苏联画报 二本 短袖衬衣五件 √小金耳环 一个
被面 二张 长袖衬衣一件 手表 二只
罗蚊帐 一床 裙子 二条 √小刀 二把
呢子裤 五条 连衣裙一条 √鱼缸 一个

纱巾 一条 国旗（五星红旗）一面 √字典二部
梭底皮鞋 一双 √碟子 四个 √小铜锣 一面
枕巾 一条 √茶碗 一个 √铜鱼锥 一个
磁花桃 一个 √糖缸 一个 √公债 35 元

北碚区革命造反派临时委员会（公章）

重庆市北碚区红岩学点红色造反军（公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以上东西前面作有√者未取得，共是 17 件。

除上情况未作 √ 符号的物资已取。

曾国纲

1967. 2. 25 亲笔

曾国纲是一名小学教员，被抄家原因是“成份不清”——“成份不清”也可成为抄家的理由，也可见那次抄家的打击面之广。后来他们找到解放前居住的生产队写了一张证明，交到红岩学点小教支部，被确认为“实属错抄”，同意所抄物资退还本人。

退还经历 3 次，第一次是 1966 年 10 月 27 日接四清工作组通知，将由 48 中红卫兵收存的伍拾伍元人民币取回，免不了表示一句：“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党对职工生活的莫大关心，我和我的家属甚为感激。”

第二次 1966 年 11 月 15 日，因“天气转寒，需要棉被和经常换洗之裤，请求给予照顾。将前交在红岩街道办事处棉絮式床，被面式张，蓝色长裤男女各一条，以及手表壹只（因工作的需要）”，要求退回。但缺资料表明是否退还。

第三次是 1967 年 2 月 25 日，由“重庆市北碚区红岩学点红色造反军”出具清单并盖上公章，得到造反派掌权的“北碚区革命造反派临时委员会”认可，加盖公章，似乎大功告成。遗憾的是有 17 件东西不翼而飞，被注明√符号未能退回。看来这些东西是真的丢掉了，后来怎么解决的，尚不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本“清单”左上角的一行字：“过，共退 19 人”，说明此次红岩街道的退还人数不止曾国纲一人，而且都通过了事后审查认定。

躺着也中枪的受累者

以“破四旧”为名，把狼牙棒伸进遵纪守法、勤恳劳动、老老实实居家度日

的“黑五类”、“牛鬼蛇神”家里，不问青红皂白抄家本来就没有法律依据，挖地三尺人走室空，抄走日常生活必需品更是与“破四旧”旗号相悖，而将其他人寄放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部抄走，就更是莫名其妙错上加错了。

请看重庆红卫矿山机器厂马宝碧要求退还被抄物品的“报告”。

重庆矿山机器厂职工马宝碧，今年 28 岁，家庭成分小商，本人成分学生。于 1956 年参加工作，当时尚未安家。1963 年在铝厂工作，被盗。后经公安机关帮助，被盗物资全部取回。由于我的工作经常调换，自己又怕东西再掉，只好把这些东西拿到北碚奶母家存放，这些存放的东西全系生活必须用品。奶母家是小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抄家（不知为何故），并把我的存放物品亦一并收去。

我的这些物品，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能证明，为此，特要求归还。

并请证明

物品清单如下：

凡布箱子一个，内装（包括用桌帕包的蚊帐……<省略号为看不清的字>）
蚊帐一床（单人） 方格花绸 5 尺 白包单一床 青毛哔叽一段 花毯子一床
枕头和帐檐、门搭各一件 花毛毯子一床 天兰布小人衣裤一套 毛料裤子二条
花线毯子一床 呢子裤子二条 呢子大衣一件 短布节四节 抹桌帕一张 技
术和安全书一本 集体照片一张 私章二枚 公债 95 元 结婚证

以上物件属实，请给以退还。

重庆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北碚区分团红岩纵队全无敌战斗队（盖章）

重庆市北碚区红岩供销合作社（盖章）

根据群众证实，与以上物资相合，请你处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重庆机械兵团红卫矿山机器厂八一五红旗战斗团（盖章）

重庆红卫矿山机器厂（盖章）

同意

区革委

重庆市北碚区革命委员会（盖章）

马宝碧这张“报告”很特别，上面盖了 5 个鲜红的大印：

第一组两枚公章是红岩供销社的造反派组织“财贸八一五全无敌战斗队”和红岩供销社的行政章。1967 年 2 月，北碚区八一五造反派已经夺权，两个章都

盖上，手续十分到位，不但表明马宝碧被错抄的情况及被抄“物件属实”，又表明本单位机构被夺权后，掌权者的合法性不容置疑。马宝碧是矿山机器厂的职工，为什么要供销社证明情况呢？“报告”上未说明，估计这可能是“奶母”的工作单位。

第二组两枚公章是马宝碧所在的矿山机器厂所盖的章，同样是该厂的造反派组织加上单位过去的行政章，证明“报告”上的被抄物品“根据群众证实，与以上物资相合”。

第三组是一枚签“同意”的区革委公章，全称叫“重庆市北碚区革命委员会”。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波及下，重庆市的造反派也夺了“走资派”的权，重庆市的最高临时权力机构为“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北碚区叫“北碚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区革委”，与1968年下半年成立的北碚区革命委员会有本质的不同），管理本区抄家物资的工作就落在区革委的肩上。从马宝碧的收条上看出，除了有几件衣裤没有得到外，那本《技术和安全》的书没有被领回，不知是搞丢了还是作为“封资修”的书处理不予退还？

收条

经收到北碚区物资代管处以下东西

泥裤1条 毛料裤2条 X 檐1样 兰布中人裤1条
枕头1对 帐檐壹个 青毛哔叽布壹段 方格绸壹段
毛巾毯壹床 包单壹床 绒毯壹床 X 布一块
凡布相子壹个 毛料裤壹条

未收到的有以下物资

小人上装一件 短布三节 卓帕一张 枕头壹个
泥子大衣小人二件 兰色和红色的。

此致

67.3.12

领物人 马宝碧（手印）

类似马宝碧这种收条的还有其它许多张，这里不一一录入。但大量的收条未能看到，故全区在此次退还工作中究竟退了多少被抄的生活急需物资，还是个谜。

保守组织1966年11月的退还部分抄家物资活动和造反派掌权的1967年2、3月份的退还部分抄家物资活动，都没有被记载入文革后官方修撰的史志。

1967年4月以后，重庆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诡异地发展，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八一五和反到底），打起了派仗，搞起了真刀真枪的武斗，把重庆打得稀烂，北碚区也不能幸免，当然就再没有谁来主持退还抄家物资了。

直到中共“九大”以后，动乱的社会秩序才逐步恢复正常，管理和处理这批抄家物资的工作就转移到新生的“红色政权”身上，也才有了《北碚区大事记》记载的抄家物资“1972年至1979年已大部清退，1985年基本退完”的那些事儿。

【故纸堆】

十一月九日重庆警备区雷副政委白副军长的重要讲话

渔歌子录入

录入者按：这是五十四军领导人在调离重庆之前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讲话的背景是：重庆持续近两年的大规模武斗已经结束，两大派群众组织已经撤销总部并陆续解散组织，各基层单位革命委员会已经陆续建立，自当年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即开始的所谓清查“国民党残渣余孽”活动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一个被人为炮制出来的所谓重庆“一号专案”——即诬陷一批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实为倾向或同情反到底派观点的前国民党军起义将领、民主党派人士、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与所谓“走资派”（实为文革前因“为民请命”而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中得到反到底派帮助进行申诉翻案的一批前中共重庆市委、共青团重庆市委干部）相“勾结”，组成的所谓“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集团”案（又称“反到底派黑高参团”案），已经整理好立案材料。就在这次震慑性的讲话发出五天之后，11月14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即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便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集团案”批准立为重庆“一号专案”。

发表这次讲话的雷远高，时为五十四军（兼重庆警备区）副政委，即将离开重庆赴昆明任云南省军区副政委兼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政委；白斌，时为五十四军副军长、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已于8月奉调国防科委第21基地任司令员。他们在离开重庆之前，以最后这一次重要讲话为自己在重庆的“支左政绩”留下了重重的一笔。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全军开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活动中的1985年3月，时任五十四军党委书记的李九龙率五十四军走访组返回重庆，向重庆人民公开检讨：当年部队在重庆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搞所谓“大批判”，办所谓“集训队”、“管训队”，伤害了地方一些干部、群众和民主人士……他代表部队党委向当时受到

迫害和冲击的干部、群众和民主人士表示歉意（详见1985年3月20日《重庆日报》）。有关历史的真相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1985年底，重庆文革“一号专案”才得到彻底平反。

本篇根据原件录入，原件为铅印宣传学习材料，无印刷单位与时间。为便于理解，略加了注释。

重庆警备区雷副政委 在“全面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动员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上”的讲话

（此系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时间：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

地点：人民大礼堂

同志们，战友们：昨天我们接到北京开八一五会议¹同志的电话，说十一月七日晚八时到八日二时开了六个小时的会，参加会的有四川、云南、山西、陕西四个省二千多人，在这个会议上有关代表揭发控诉了邓长春²、方文正³（呼口号）这两个杀人凶手、坏头头所干的严重罪行，主持八一五会议的同志按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呼口号）当场将邓长春、方文正正式逮捕法办，交北京公安专政机关代押。四川、重庆地区全体代表进一步揭发批判了他们所犯的罪行。今天开会的同志打电话回来说还要把邓长春、方文正交给代表们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斗争，要把他们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中央、中央文革这一英明决定，非常及时、非常正确。是对山城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极大支持，极大鼓舞（呼口号），是对阶

¹ 八一五会议：从1968年8月15日开始，由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在北京召开了各地国防、冶金等重点工矿企业的造反派及相关领导干部、军代表参加的所谓“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因会议涉及的工业系统部门多，事出仓促，主事者竟没有想出一个准确的会议名称，一般都以会议开始的日期简称为“八一五会议”。会议实际上是要赶在中共“九大”之前强行解散各地重点工矿企业群众组织、终结工人造反运动的大型“学习班”，规模大，时间长，参加者有上百家重点企业的数千人，直到1969年1月才基本结束。

² 邓长春（1945～2003），四川宜宾人。文革爆发时为国营重庆望江机器厂工人（车工），共青团员。1967年夏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工总司勤务组常委。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常委，半年后即因杀俘、“破坏大联合”等罪名在中央召开的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部分协作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即“八一五会议”）上按中央、中央文革指示逮捕，从此遭到关押、批斗。文革结束后1978年4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87年刑满（减刑两年）出狱后在私营企业工作。2003年春节在职工团拜会上讲话时心脑血管病突发病逝。

³ 方文正：1941年生，江西万年人。烈士之子。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文革爆发时为国营重庆空气压缩机厂技术员。文革中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空压厂八一兵团负责人、八一兵团总部副班长。1968年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常委，半年后即中央召开的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部分协作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即“八一五会议”）上因杀俘、指挥武斗等罪名按中央、中央文革指示逮捕。关押至文革结束后1978年4月由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实际已关押9年），宣判后即刑满获释，回江西老家从事技术工作。

级敌人的沉重打击，是对叛徒、特务、走资派、黑手、坏头头的沉重打击。中央、中央文革的英明决定，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阶级敌人威风。中央、中央文革这一决定也是强劲的东风，必然是阶级斗争中清理阶级队伍的巨大力量和动力，在这一强劲东风的推动下，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必然更广泛、更深入、更有成效地开展。我们对中央、中央文革决定逮捕邓长春、方文正坚决拥护，让我们共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呼口号）

邓长春、方文正两个坏人，这两年来混入了革命群众组织，篡夺了领导权，干了一系列坏事，犯下了一系列罪行！现在在北京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同志在揭发他们，现将揭发情况向同志们摘要汇报，这是初步掌握的，只简单谈一下，他们有一系列严重罪行，要发动群众揭发，现在掌握的材料已经十分严重，骇人听闻。

邓长春据群众揭发，有很多人命案，突出的有两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¹，在舰艇反到底一号船上，邓长春为了纪念武斗中打死的舰队副司令李鲁沂，举行了追悼会，会上邓长春亲自下命令枪杀两个革命同志，为李鲁沂这个坏蛋祭灵。邓长春本来决定要枪杀四个同志，其中有两个学生²遭到别人反对才没被杀，但陪了杀场。被杀的两个同志是他们所谓的俘虏，没搞过武斗，其中有一个很好的民警同志，是转业军人，名叫吴×³（未听清），听说他们要杀人祭灵就抗议他们说：是犯法的，这是犯罪的行为。就是因为抗议了他们，就决定枪杀他。当知道要枪杀他的时候，这个同志表现很英勇，说杀他也是犯罪的行为。杀人凶手具体是谁？就是臭名远扬的付明礼，后来淹死了。当时邓长春把李鲁沂⁴留下来的手枪交给付明礼，令他杀害了这两个同志，尸体被丢到了江里，这是一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邓长春在“黄山警备司令部”亲自批准下令枪杀了武斗中抓到的上新街××五金合作社工人×××⁵（未听清）。更恶劣的是这个工人同志身上戴的毛主席像章，别人问他怎么处理，邓说：连人带章一起埋掉（呼口号）。其他还有，他不仅只是这三条人命案。

¹ 此日期不对。李鲁沂随“舰队”到杨家坪后，参加了反到底派电校东方红与电技校井冈山的王家大山保卫战，1967年8月18日凌晨八一五派突袭王家大山时身亡。邓长春为其开追悼会是在两天后的20日。

² 两个学生是五十中的八一五派学生胥松涛、吴开华。1967年8月18日上午被俘，关到电技校，20日上午被押到邓长春杀俘的“反到底一号”船上“陪杀场”。

³ 应为鄧江，驻重庆钢铁公司的公安消防队队员。

⁴ 李鲁沂（1947～1967），初中未毕业（15岁）即参军，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患急性风湿性心脏病退伍。文革爆发时为国营嘉陵机器厂工人。其父高兰戈（李鲁沂随母姓）原为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文革前因“萧、李、廖”一案受到错误批判，文革中起来翻案要求平反，得到反到底派支持。1967年夏李鲁沂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负责人，8月初率船加入邓长春组织的“舰队”，任副司令。随“舰队”到达建设机床厂后，协助黄葛坪地区反到底派守卫制高点王家大山，18日凌晨遭八一五派突袭时身亡。

⁵ 应为申继光，于1967年8月22日邓长春组织攻打南岸上新街八一五派时俘虏。一说是当天押上山后即被下令枪杀。

邓长春第二件罪行是私设电台，他亲自决定在反到底井冈山舰队之间及与“黄山警司”之间，舰队与望江之间勾通无线电联络。在国民党将官的参与下还安设了大功率电台，与早已被捕的当时在北京的五·一六分子李扬快¹联络。他同时还使用了有线电密码通讯。他搞的大功率电台是什么？实际上是向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台湾告密，是属反革命事件。邓长春也就是一个违抗中央九·二三通令²的反革命首犯之一。

第三，邓长春与党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勾结在一起，策划、制造、指挥了一系列武斗事件，对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六七年七月，邓长春等人在所谓“武装保卫山城”这个反动口号下面，在走资派操纵下，亲自决定把国防厂一万二、三千条新式武器发出来，扩散到外面，而这些武器是保密的，我们的解放军部队也没使用过。这就造成了山城武斗的升级。这些武器后来东面扩散到湖北，南到贵州，北面到了新疆。同时，邓长春还到处吹牛皮说：“在杨家坪有某司令控制建设，在江北有某司令控制长安，在南岸有邓司令控制，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要人有人。”武器大量扩散，武斗升级，这是阶级敌人借群众之手杀我们阶级兄弟，这个账要记在阶级敌人、国民党残渣余孽、坏头头邓长春头上。一九六七年八月邓长春与望江厂走资派³策划对抗中央军委到厂调紧急援越物资××炮。邓长春与厂走资派一起说：“炮你们不能调走，我们要用，不准你们把炮拿去搞兵变”，“就是不能给黑部队”，阴谋蒙蔽群众，后来这些炮扩散到涪陵等各地。六七年八月“八·八”红港事件，也是邓长春与走资派共同一起策划的，里面还有什么周参谋，周胖子。去年七、八月初他们抢了三条船，船上装备了××炮，大的一只竟装了十门之多，组成了一个舰队。邓长春在北京交待说：在成立舰队之前，他想把长江打通，把望江、建设、长江、空压联起来，把嘉陵江的长安、三钢、江北、沙坪坝连接起来，包围市中区，最后夺取市中区。这个主意是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想的，小小邓长春想不出来。就在这个舰队组成的时候，一个走资派曾亲自任命邓长春为舰队司令，李鲁沂为副司令，还任命了舰长，并由他交待了舰队队形变化各种规定，联络信号、开炮信号等等，难道这是小小的邓长春想得出来的事吗？八月八号那天，舰队三条船从望江开出，首先向东风造船厂进行炮击，后沿江而上，边走边打，重点是红港，是长江厂，这样一直打到九龙坡，打死二十一人，打伤一百一

¹ 李扬快（或写作李阳快）是文革初期曾到重庆串联的首都红卫兵一司成员、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² 九二三通令：即1967年9月23日以中发〔67〕303号文件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取缔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的命令》。这个《命令》发布于大规模武斗告一段落之后，把《命令》发布之前一个多月有过的行为称为“违抗中央九二三通令”，显然讲不通。

³ 所谓“望江厂走资派”全系诬陷。文革结束之后的1979年3月21日《重庆日报》发表《望江机器厂纠正一批冤假错案》，报道称：“望江机器厂最近召开全厂职工大会，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为迫害致死的原厂党委书记魏颖贤，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本市报纸、电台公开点名批判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李培源、副总工程师黄克勤，设计所所长、工程师石寅生等同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只是只字未提当年炮制这些冤案的直接责任人，而含糊其辞地笼统归罪于“林彪、‘四人帮’疯狂推行极左路线”。

十二人，打沉四条船，打伤十四条船，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严重损失。这个舰队后来还在涪陵参加了武斗。是走资派在望江任命邓长春为舰队司令，李鲁沂为副司令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邓长春、周参谋，还有更大走资派，这次武斗副总指挥路斌武¹一共同策划攻打上新街，把无辜群众打死二十二人，其中包括幼儿园的小孩。

邓长春在望江还亲自策划抢劫了从武汉上来的五条船的物资，一共抢了三百五十四吨百货，通通被他糟蹋了。还有一次从外省运到重庆加工的生猪二千四百多头约三十多万斤以上，全被拦劫了。杀的杀，吃的吃，死的死，丢到江里。那时，我们的无线电就收到他们发出的无线电，叫他们其它单位到望江领猪肉，说要领多少有多少。

此外望江地区击沉军分区交通艇即所谓“八·三”事件与邓长春关系密切，所谓“八·一三”事件也一样，由于进攻了当地驻厂部队，打死张参谋长和战士两名，后来我们考虑到军民关系，全部撤到铁山坪。邓长春在那时还想有更大的行动，把这个部队赶走和消灭。在北京知情的同志揭发邓长春还准备组织一百个连兵力攻打重庆警备司令部（现警备区）。揭发他今年七月在宜宾准备组织一百个连兵力打回重庆。这个反革命的计划是不可能得逞和实现的。

今年八一五会议期间，邓长春预感自己前途不妙，急急忙忙赶到北京进行非法活动，他招摇撞骗，盗用李大章同志指派他来工作的名义，大搞非法活动，搞了地下核心小组，会外联络组等。当大会正促成两派大联合、三结合时，他说：“现在条件不成熟”，当阴谋未得逞后又叫嚷：“不搞大联合，先搞三结合。”当会议强调与社会脱钩，他又说要把群众组织过渡到三代会、革委会去。由于他的非法活动，有关单位警告他说再闹要扣他，他则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杨成武过去不是了不起吗？再过两个月，形势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前次我们在成都就听说了：一是顶、二是拖，拖到十二月底就是胜利。”目前山城也出现这个口号。这是极端反动的口号。在会议清理阶级队伍时，邓长春顽固抵抗，搞攻守同盟，威胁揭发他的人。他还说：“什么揭阶级斗争盖子，就是你我这些人没抓起来就是了。”这话也说对了一部分。

根据揭发，邓长春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野心家。他曾吹嘘：“世界革命看中国，中国革命看四川，四川革命看重庆，重庆革命看军工，军工革命看望江”，下面话就说：望江革命看邓长春。同时群众中间都说他是一个小蒋介石。

¹ 路斌武：老红军、老干部，时任中共南岸区委副书记，称其为“武斗副总指挥”纯属诬蔑不实之词。此后路斌武一直遭到批斗、关押，在“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中被打成“反动组织三老会”头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黑手”，遭受残酷迫害。1973年纠正“批清”错误后才“落实政策”安排为区委副书记、区革委副主任，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彻底平反。

这话讲到了家，揭出了他的实质。(呼口号)邓长春他还多次把矛头对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说：“毛主席指示是最高指示，我邓长春的指示算半高指示。”同志们，邓长春的罪行是很多的，这里只是简要谈了一部分，我们相信，充分发动群众，可以把他的罪行全部揭出来的。

方文正这个坏头头也干了许多坏事，一次他亲自策划枪杀了五个革命同志，是一个杀人的凶手。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两派武斗，一方面不听中央文革三点指示，向空压厂进攻，这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另一派在空压在方文正操纵下讨论是撤还是打，多数人同意撤，这时他阴险地问大家：地下室二十多个所谓的俘虏怎么办？有人说手榴弹把他们全炸死，方文正当时同意了并指名三个学生去执行，叫他们执行完后到外面一菜地会合，后地下室通道堵塞被火力封锁不通，未去炸成。方文正他们也就二十二号撤走了，另外一派也没进去。二十三号晚上，炮火很猛。方文正他们又回厂来开会。会上方文正再提出怎样处理二十多个所谓俘虏的问题，一个叫何大发¹的说：“全部炸死太多了，把有血案的五个打死。”方文正同意了，并叫何大发带三个学生去执行，何大发就将五个人提来带到一个车间旁枪杀了。这五个人中一个是车间政治指导员邓×²(未听清)，是个好同志；一个是邓的爱人刘素德³，是家属委员，二人均是共产党员，一个是部队转业军人，过去是大尉，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学生。特别残忍的是刘素德同志怀孕五个月。邓说：“你们杀把我杀了，不要杀我爱人。”遭到何大发拒绝，邓又要求说：“你们等刘素德把孩子生了后再杀吧！”何大发等人说不行而全部枪杀了。(呼口号)事后方文正等人就订了攻守同盟，欺骗中央调查组说是学生枪杀的，把责任推给学生。同样方文正是搞打、砸、抢的罪魁祸首。去年武斗使用坦克，方文正负主要责任，在方文正的策划指挥下，使用坦克把另一派赶出了厂子，指示人烧了另一派住的俱乐部。方文正还批准动用了坦克机关枪三十多挺，扩散到了社会，方文正也亲自计划决定制造所谓八一五式冲锋枪。九·五命令下来后，方文正拒不执行，不上交武器，把部分武器转移到华蓥山搞武斗，今年五月他参与召开了空压、建设、长江、江陵等会议，打着八一兵团要左右山城局势的幌子搞扩军备战，在空压的一次武斗总结庆功会上，方文正得意洋洋说：这一仗打得有理有利有节，打出了水平，进行了表扬，还大吃了一顿。就在那时间，方文正亲自指挥抢劫了国家一百二十万发子弹，并决定支援扩散到专县。还搞什么签字，拉人家下水。这次中央召开八一五会议期间，方文正同样搞非法会议，也搞什么会内会外联络

¹ 何大发：1942年生，四川璧山（今属重庆）人。文革爆发时为国营空气压缩机厂22车间车工，共青团员，退伍军人。参加造反后任八一兵团负责人。1967年8月武斗中撤退离厂时将对立派俘虏5人押至12车间丁字路口枪毙。1968年9月空气压缩机厂革委会成立时任常委。随即在中央“八一五会议”期间被揭发武斗中有杀俘罪行，为争取“从宽”，称杀俘为方文正主使。12月22日空气压缩机厂革委会报告免去其厂革委会常委职务。文革结束后1978年4月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回璧山老家经商。

² 应为邓荣，空压厂供应科260工地指导员，转业军人。

³ 应为刘素芳，空压厂家属委员会指导员。

组、指挥组，说什么要防止出现第二个刘陵川¹啦，企图统一口径。在他被指定到北京开会之前，继续搞攻守同盟，有关单位审查几个学生杀人事件时，他就控制了他们，并要几个学生将写的坦白书交给他看等。

对邓长春、方文正这两个坏头头犯下的严重罪行，这只是一个轮廓。很多事情，由于各种原因不便讲。我们希望山城原两大派组织的同志和所有的革命同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彻底揭发批判。对他们揭与不揭，彻底揭还是避重就轻谈一点，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是我们同他们划清界限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是中央、中央文革的决定，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是紧跟不紧跟，是跟与不跟的重大原则问题，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运动，把他们揭深、揭透、批倒、批臭。（呼口号）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邓长春、方文正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要与他们严格划清界限，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毛主席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对邓长春、方文正揭与不揭，就是站在哪一边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广大群众，特别是与他们有联系，犯了错误的同志勇敢站起来，揭他们所有坏事，大会小会上揭，口头上揭背靠背揭，写材料揭都可以。尤其是望江、空压两厂的同志及国防厂的同志，对他们情况知道得多，要站在斗争前列，把他们的面貌揭出来，彻底肃清流毒，有些知情人作过坏事，犯了错误的人不要有任何顾虑和幻想，你揭与不揭就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不揭就越陷越深继续犯错误，你包庇了坏事，就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与他们一起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就怕与自己联系在一起，过去你们就是同他们在一起犯了错误，不揭就联系越紧，揭了就可以划清界限，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再一点就是揭他们的黑手、后台。前面谈了一点，事情很清楚，有黑手、后台，如于克书²、李培源、黄克勤、杨林山、石印生³等，不仅如此，后面还有更

¹ 刘陵川：1941年生。文革爆发时为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22队保修工，参加造反派任八一五派汽车兵团负责人。1968年中央“三一五”指示对八一五派“打倒刘张”作出严厉批评后，刘陵川联络极少数人组建了八一五派“忠于毛主席联络站”（主张承认错误，与反到底派联合）。在八一五派内部被视为“叛徒”，遭到孤立，但得到四川省革筹组的支持。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委员。

² 于克书（1924～2004），山东牟平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青委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参加接管重庆后长期从事青年团工作。原为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1962年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写匿名信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映四川领导人李井泉违法乱纪，独断专行，强迫命令瞎指挥，造成粮食大减产和四川群众大量非正常死亡等问题。后被李井泉查出，遭到打击迫害，被定为“萧李廖反党集团”成员，批判后撤职下放劳动。文革中起来翻案要求平反，得到反到底派支持，被五十四军领导人视为反到底派“黑后台”。1967年夏为躲避武斗迫害，逃到反到底派占优势的建设厂。后被五十四军领导人公开诬指“于克书就是赤膊上阵，开枪，火烧国防仓库”、“死心塌地出谋划策，赤膊上阵，并亲自打机枪”等，被《重庆日报》公开点名称之为“反革命黑手”，遭到残酷批斗，一条腿被

大的后台，他们干的一系列坏事都是与叛徒特务走资派联系在一起的，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于克书就是赤膊上阵，开枪，火烧国防仓库，后面还有更大的幕后人物，我们不仅要揭这两个不大不小的坏蛋，还要把后面大的，埋得深的，阴险的揭出来，要顺藤摸瓜，揪出黑手、后台。有的十分阴险毒辣的，他们有充分的反革命阴谋策划，人们不容易看穿，把他认出来，但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隐蔽得那么彻底，到关键时刻他们说上一句话就起了决定性作用，据我们掌握的确切材料，有一个秘密参谋组，一个很大的黑高参集团，很大的反动集团，山城两年来出现的反动小报、宣言、声明很多，都出于这个秘密参谋组之手，这个组下面还有帮黑秀才，什么《人民战争救山城》这篇文章是小将写的吗？是那些吃洋面包的人写的，后来还有什么一论二论山城武斗是怎样升级的，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显微镜去深挖幕后的黑手、后台，把他们揪出来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对同邓长春、方文正一样犯了或大或小罪行的坏人，你们要混是混不下去了，山城广大革命群众受了两年锻炼，乱了两年，乱得好，把敌人乱出来了，正好来个大扫除，大清理。对于同邓长春、方文正一起干了坏事的坏人、罪犯，按党的历来政策，送他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他们也要区别对待。如果他们继续顽固下去，绝不能逃出人民法网，只有死路一条。如能彻底坦白交待他们与邓长春、方文正的罪行，可以给出路，从宽处理。现有一个具体例子，北京八一五会议上与邓长春一起杀过的人不止一个，也有自己单独处理杀人的，但现在觉悟了，或迫于形势坦白交待得好，就并没逮捕他。只逮捕了邓长春。也有与方文正一起杀过人的，如何大发，名单是他提的，五个人是他叫来捆起枪杀的。但何大发比较早的交待了，虽然交待还不大好，受了大会批判斗争，但也因他坦白交待早而没有逮捕他。这是不能有什么幻想和侥幸心理的，有一个犯罪分子到北京第一天他睡不着，第二天就找领导坦白交待了他的罪行，也没有逮捕他。只要坦白好，还可以从宽处理。再说一句：警告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中或幕后的犯罪分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再送八个字：“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我们不仅要彻底揭发邓长春、方文正及其黑手

打断致残。1975年“解放”后任重庆氮肥厂厂长、重钢五厂厂长。文革后1983年获得平反。1984年离休。
³ 石印生，应为石寅生。李培源、黄克勤、杨林山、石寅生均为重庆望江机器厂干部，被五十四军领导人诬为反到底派“黑后台”、“反军黑手”，按五十四军领导人定下的调子，1968年10月27日《重庆日报》第三版整版发表一组署名文章：《谁反对解放军我们就和他拚》《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在我厂的代理人李培源》《彻底清算李培源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反革命罪行》，并在署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望江机器厂某部 钢长城”的文章《刮它一场对敌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彻底揭开望江厂的阶级斗争盖子》中诬称：“望江机器厂以原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李培源为首，包括杨林山、黄克勤、石寅生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以百倍的疯狂，千倍的仇恨，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以比戈培尔还要卑鄙的造谣伎俩和最恶毒的语言辱骂、诽谤和中伤驻厂部队和军管会，挑拨离间军民关系……他们蒙蔽一部分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策动大规模武斗，制造枪杀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枪杀革命群众、中断长江航运、抢劫国家物资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使人民的生命和国家财产蒙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当时，这伙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得意忘形，满以为从此天下大乱，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美梦就可以实现了。”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这些诬蔑不实之词才被推翻，李培源等蒙冤干部才得到彻底平反。

后台，还希望各单位结合中央、中央文革法办这两个罪犯的东风，揭开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有的单位现在开始了，有的没有，但进展迟缓，不令人满意。（呼口号）

我们必须提高阶级警惕性，加强敌情观念。重庆的敌情严重，叛徒、特务、走资派各单位有多有少，是一小撮，但数量也不少。这里向同志们介绍一点情况：有一个叛徒、特务、走资派勾结在一起的集团，他们曾经与萧、李、廖¹搞在一起，为萧、李、廖、罗广斌²翻案。他们说：“要把为萧、李、廖翻案作为解决重庆问题的突破口。”又说：“萧、李、廖问题是一个重磅炸弹，到时候抛出来他们就会完蛋”，说“凡是过去受压的干部都要翻案”。说：“凡不为萧、李、廖翻案的人就是任白戈的一小撮同伙。”他们主张先翻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的反革命的案，再翻五七年右派的案，再翻建国十七年政治运动的案。一个当过区长的在今年一月份召集了几个右派开会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现在你们要起来造反。”就是这一伙人组织了绝密参谋组，这是他们自己取的名字，这个组下面组成了一个“反逆流战斗队”，是一个黑秀才班子。什么“目前形势和任务”、“重庆七、八月枪声从何而来”，“对目前重庆形势的看法”、“黑六条”等，都出于这个黑秀才班子的手。重庆过去是国民党的陪都，留下了大批国民党残渣余孽，重庆又是和平解放，在刘邓李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包庇重用这些人，现在我们已发现这批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搞了若干个反革命集团，他们没睡觉，他们打算在重庆建立一个国民党基地，把从旧社会留下的渣滓收集起来，叫他们

¹ 萧、李、廖：即萧泽宽（原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原中共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伯康（原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1962年2月底中共重庆市委召开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干部们对四川的“反右倾”和省委主要领导人李井泉的工作作风等提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书记处曾派人赴川调查。但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抓“阶级斗争”后，1963年重庆市委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按照李井泉旨意清查向中央反映意见的干部，按“反党集团”性质处理了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及于克书（团市委副书记）、王竹（团市委副书记）等人，文革开始后又将“萧、李、廖”作为“反党黑帮”抛出批判。后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支持下，萧、李、廖等赴京告状，重庆反到底派也参与了为他们翻案的工作。因而萧、李、廖等一直被五十四军视为反到底派的“黑后台”、“黑手”。直到文革结束后“萧、李、廖”一案才得到彻底平反。

² 罗广斌（1924~1967），四川忠县（今属重庆）人。1948年3月加入中共，9月被捕。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当局从重庆败退前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政治犯实行大屠杀之夜，从白公馆看守所率十多人逃出。中共执政后，罗广斌长期致力于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领衔写作了纪实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和长篇小说《红岩》。但在此期间，有关方面从陆续捕获的前国民党特务、官员的交代中，却得知罗广斌当年是被释放或已经通知释放出狱的（实际上罗等逃亡时并不知道此情），因此对其出狱情况产生怀疑，进行了反复调查仍未能得出明确结论。文革前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这个长期合作的三人创作集体被市委安排调入重庆市文联任创作员（专业作家）。文革中他们参加造反并率先在重庆市文联夺权，建立了实际以罗广斌为核心的文革筹备小组。1967年1月下旬重庆造反派按毛泽东号召在驻军支持下夺权建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后，罗广斌站在反对革联会的部分造反派（后称反到底派）一方，被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首的革联会一派视为“山城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政治扒手”。于1967年2月5日遭到绑架后于2月10日在关押地跳楼自杀身亡。此后被八一五派以“叛徒”罪名展开大批判。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和重庆反到底、成都八二六派一直致力于为其鸣冤翻案的工作，直到1968年中央首长“三一五讲话”中江青明确表示对罗广斌的否定后，北京地院东方红的罗广斌专案调查组才被迫停止工作。1972年6月7日，重庆市文联批批改组上报对罗广斌历史问题的定案处理意见：“罗广斌的政治历史应作叛徒结论，永远开除出党。”文革结束后此罪名被推翻，1978年11月11日重庆市为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中，搞隐蔽活动，在武斗中引导夺取武器库，占领兵工厂，拿下市中区，再后是江北、沙坪坝、大渡口、北碚等区，然后控制全重庆后经贵州、云南与缅甸国民党残余勾结，占领江南各省，接台湾国民党反攻。他们表面上老实，实际搞了很多活动，开各种大小会，经常一起研究重庆形势说：“多看两派争论什么，我们就宣传什么，挑动他们打一架，等气平了又挑动他们打。”说：“武斗严重的地方就是我们作工作的地方。”说：“我们的工作要建立在武斗的基础上。”并利用他们的子弟、社会关系辱骂解放军，去冲击解放军，故意挑担子挤碰解放军然后又吵又闹来丑化解放军，诬蔑谩骂解放军是“歪屁股”，挑拨军民关系。策动抢走解放军全部武器。说：“解放军手中的武器抢完了就不攻自破。”说“抢了武器库就扩大我们的资本”等。当中央“红五条”点了任白戈的名后他们说：“从现在起任白戈就是我们的人了。”一个老头子在某派头头作报告时是每场必到。

就是在这些叛徒、特务、走资派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策动下制造了若干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如杀人案件，国防厂各大工厂几乎都有杀人案件，嘉陵、江陵、二钢、三钢、建设……等，其他单位也有，如一个东风厂，属重庆管，厂不在重庆，一次就抓了二十多人，一次就枪杀了十四人，其余六个被关着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全部饿死了。他们还枪杀解放军，击沉军分区交通艇，打死三个战士，还说那不是解放军战士，是从哪一个地方拣来的。更使人气愤的是，交通艇出水后，他们在广播上说“里面的不是人骨头，是猪骨头，狗骨头”。打死军分区张参谋长，什么两路口宽银幕事件，更是全川、全国罕见的。纵火案也很多，如建设、江陵、嘉陵、长安，打消防车事件也越来越清楚了。××厂最精密的车床烧了，礼堂里埋满了地雷，总开关与礼堂电是接通的，等开会的人来了就炸，××厂两次纵火焚烧要害车间。消防队事件现也开始揭发了，下命令开枪的人正在北京揪斗，他一方面指使人纵火，一方面打电话给三钢的同伙说：“有人来救火就开枪。”等枪一打响后，他又打电话到三钢说：“你们打得好，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就在三钢这个开枪的时候，楼上就有一个很大的走资派在，还是一个区一级的当权派。还有什么抢劫国家仓库，交电公司放火烧了，抢了三八商店等，据说在一个走资派策划下，一次就拍卖了毛线十万斤之多。杨家坪有一个我们总仓库，属中央管，警备区、军区都无权动用的战略仓库，武斗中在走资派策划下抢了胶鞋、水壶、罐头等等，这些罐头在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反击战时那样困难都没动用过，这次被糟蹋了。而且还动用了战备血浆×××万毫升之多。

有人谈到重钢有个“遵义红旗”¹组织，是几十个中干组织起来的，中央首

¹ 重庆钢铁公司的“遵义红旗”是一个反到底派观点的干部组织。1978年7月7日《重庆日报》报道《重钢彻底为三大冤案错案昭雪平反/所谓“潜伏特务集团”、“三八技训班特别机构”和“坏组织”〈遵义红旗〉三大冤案错案受害的同志得到昭雪平反，使正气得到伸张，人心大快》，报道中说：“重钢的三大冤案、

长讲了(江青同志)，说这个组织是个坏组织，他操纵两派打内仗，这个组织的人不会都是坏人，也有好人，但组织是坏的，是坏人操纵的，要揭开盖子，有人想为这个组织翻案，这是痴心妄想，翻不了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了的，谁要翻案就要粉身碎骨。另外反革命的标语，与敌特挂钩，喊反革命口号、强奸、抢劫等等这些事统统是阶级敌人干的，这个账一定要记在阶级敌人头上，不能记在群众组织头上，这是原则区别，要严格区别开来。干了这些坏事的坏人有的还逍遥法外，这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要行动起来，深入开展大批判，对阶级敌人主动进攻。清理阶级队伍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是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号召，是我们当前全市人民中心任务之一，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借八一五会议的东风，对阶级敌人刮它个十二级台风，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挖出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现在我们照北京的情况和经验谈一下我们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

首先要加强领导，各级革命委员会、军管会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首长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充分认识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深入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要反右倾，同时也要警惕阶级敌人以极左面貌出现，扩大打击面，制造混乱。

第二，清理工作必须与大批判结合起来进行，清理中揪斗坏人要结合批判刘少奇制定的反动路线，彻底揭露他们的罪恶勾当。对本单位叛徒、特务、走资派批判时，要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联系起来，以便真正把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肃清。这次北京八一五会议中，首长讲冶金部长吕东是个假党员，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地区工作，后到晋察冀，就是彭真搞招降纳叛，问他是不是党员，吕东不是也就说了是党员，彭真就叫他到某单位当支部书记，当他问组织关系怎么转时，彭真就说：你到组织部开个证明就行了。那末他本人填表怎么办，他就写在太行地区入党，介绍人就填上两个与他谈过话叫他争取入党的同志的名字。这个例子很生动。现批判本单位走资派，要与刘、邓、陶联系起来彻底批判。

第三，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掌握稳准狠的政策。根据中央首长讲，稳就是稳重，准就是调查准确，狠就是对敌人不手软。要严肃注意区别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要把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坏人与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开来，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与叛徒特务区别开来，要把有一般错误与政治性错误区别开来，要把有小偷小摸或受坏人蒙蔽搞了打砸抢的与流氓、阿飞区别开来。绝对不允许借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群众。对敌人要狠狠打，对人民内部要求说服教育，对犯错误的人要团结、争取、教育，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犯了严重错误的要教育他们改正错误。就是对坏人、敌

错案是叛徒江青直接插手而炮制出来的。”

人也要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区别对待方针，以便分化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对邓长春方文正就是具体体现了这个政策。

第四、注意调查研究。认真搞好调查研究，要群众揭发与专政机关专案调查结合起来，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严禁逼、供、信。据说有的县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打死人现象发生，这是不好的，但也不要怕，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故意制造混乱。对敌人我们不是采取肉体上消灭(个别法办的除外)。群众组织更无权力了。要有领导的交群众批斗，防止坏人制造混乱，混水摸鱼，防止阶级敌人陷害好人，搞阶级报复。

第五、凡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单位，揪坏人时两派不要互相揪，要自己揪，以防敌人搞派性斗争。绝不能互相打击对方组织，两派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我们相信，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响应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号召，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最短时间内，刮起对阶级敌人的十二级台风，把本单位对敌斗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轰轰烈烈搞起来。矛头要指向叛徒、特务、走资派，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向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口号略)

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五十四军副军长白斌同志的讲话(摘录)

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我补充一点意见，总的是声势不大，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击得不狠，主要是领导不得力，群众没有很好的充分地发动起来，怎么解决，雷副政委、唐司令员已讲了，今天的会就是一次动员会。

我补充的意见，首先是解决一个态度问题。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个原则问题。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单独列为一条：“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我们对照公报，结合本单位的情况看一下，混入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挖出来。最近我们对阶级敌人进行了两次打击，这只是一小部分，是零头，小零头。清理阶级队伍是斗批改的重要阶段。要很好学习其它先进地区的先进经验。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力争三个月搞完它，把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结合起来。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才能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全面胜利。有的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搞得不好，这是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结果。那些革命、生产不好的单位就是阶级敌人破坏的，当然也有资产阶级派性。不外这二个原因，或居其一，或二者都有。对清理阶级

队伍抱一个什么样态度是一个立场问题，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党性立场上，把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中的阶级敌人彻底清除出来，绝不能手软。否则保护了他们。当前个别领导怕抓错了犯错误。如果当前对清理阶级队伍抱消极态度，同样要犯错误。

再一点，我们贯彻、落实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同时要紧跟北京八一五会议精神，并同大会紧密配合，这里我表个态：坚决拥护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依法逮捕邓长春、方文正的决定。邓长春、方文正是山城两大派头头，原来我们警惕性不高，被他们混入了革命群众组织，篡夺了领导权。现在问题揭开了，是坏事也是好事。邓长春这次到北京是送货上门。本来八一五会没有通知他去开会，为什么他匆匆忙忙要去？实际上他去就是破坏，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八一五会议，企图把坏人包下来，也把自己包起来，到了北京邓长春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他破坏国防、冶金、煤炭三个会的地方，人人都喊打倒他。他的犯罪，不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因他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

方文正到北京是通知他去的，他的罪行就是执行他枪杀人命令的何大发检举的，过去他们是不讲革命原则的联合，是兄弟伙，是青帮、红帮。揭发邓长春的也是他下令执行枪杀的人，也是一帮兄弟伙的酒肉朋友。他们不是革命原则下的团结，他们的罪行总有一天会全部揭发来。山城若不混进这些坏头头，山城形势不会这样，概括讲是这一小撮坏头头，还有后面的黑手破坏了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山城落后了几个月甚至一年，我们要与他们算这个账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把他们揭出来就是好事，可以把山城阶级斗的盖子揭开。从去年二月份山城分裂成两派以后出现的重大事件，也一样锻炼了群众，暴露了敌人，也才能把他们揪出来，打倒他。刚才雷副政委讲了揭发批判他们的罪行，更重要的是揪出他们背后的一小撮，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邓长春背后有一个黑高参集团，这些黑高参集团成员已有一部分落到我们手里（鼓掌）。我们不仅要检举、揭发他们的罪行，还要彻底进行批判。对敌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政策性很强，雷副政委、唐司令员已讲了，我就不多说了。

只要我们很好的掌握了稳准狠政策，哪一个阶级敌人也逃不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准字，稳是为了搞准，搞准了才能对他们狠狠打击，绝不手软。同时，要注意不要误伤好人。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就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阶级敌人也会陷害好人的，但我们也不要过分害怕，抓错了，认个错嘛！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肯定会有抓错的，我们能及早发现，就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再一点，参加武斗的群众要与杀人犯放火犯现行犯区别开来。造反派头头有个活思想认为：凡是搞过武斗的都脱不了身。这个说法不对，刚才雷副政委讲了，

逮捕了邓长春、方文正，但亲手执行枪杀人的凶手，这次检举、揭发了事实，现在并没有逮捕他呀！这里要把一般参加武斗的群众与邓长春、方文正等残杀阶级兄弟的人区别开来，否则打击面太宽。去年参加武斗，两派拿起枪的在前头打的约六万人，加上后勤支援的约十万人左右，这是估计，没统计过，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是革命的好同志，坏人只是其中百分之一、二、三，绝不能扩大打击面，要缩小打击面。今年在北京，两派交心时，我们说有的头头有血债，进入革委会不好。我们明知他们有血债，也不大赞成他们进入，你想，革委会里有杀人犯还算什么革委会，但也有混进去的，革委会不是保险柜，中央这次不仅点了邓长春、方文正，还点了山西长治市革委会一个副主任。阶级敌人混进群众组织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并不奇怪，如不混进才奇怪哩。不能把同邓、方一起工作过的都认为是坏人。所以，反到底派是革命群众组织，邓长春不能代表反到底，是混入其中的坏人；八一五是八一五，方文正是方文正，他也是混进了八一五。这是阶级斗争规律，两派如不混入人那才是怪事。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混入了个刘少奇。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要钻的，我们一定要有机斗争观念。

过去有的人说：“否定×××就是否定××派。”这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这次中央否定了方文正，并没有否定八一五，否定了邓长春，并没有否定反到底，各是各的，两个家伙都是坏人。革命小将革命性够，科学性少，话说早了，就被动。

邓长春、方文正是混入山城两大派的大头头，就有部分同志与他们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但不能说有联系的就是坏人，我也与邓长春、方文正握过手的呀，也有过工作关系，你就不能说我也是坏人。他们是伪装的敌人，过去并不知道。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参加武斗的群众要与策划武斗的人区别开来。于克书是死心踏地出谋划策，赤膊上阵，并亲自打机枪，把转盘百货站、银行都打起了火。而有的领导干部在武斗中被迫参加了会，强迫人家扛炮弹，拿枪杆，人家不干他们就要打嘛！如把这些干部说成是黑手是不对的。把被迫参加武斗的革命干部与黑手区别开来，绝对不允许把被迫参加某一派武斗的革命干部都打成于克书，他们参加武斗是错误的，但不能都打成黑手，有的是被迫参加的，对于于克书这种人坚决揪来狠狠打击。

还有对敌斗争，清理阶级队伍要在革委会、大联委的领导下，不能打人，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头脑一发热就干，那总有一天要犯大错误，这些教训，头头要很好吸收。最近街上写出了两条标语，一条是“横扫乱军小爬虫”。这是很错误的，附带说一下，革命小将对解放军态度上说了错话，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是受了骗，他们本人就是受害者，这条标语的矛头是指向群众的。还有一条“揪

出打刘张的小爬虫”，同样错误，也是把矛头指向群众。

两年以来，国民党残渣余孽组成的将官集团和叛徒、特务、走资派组成的黑高参团，同志们应该早就明白，他们就是混了进来，我们早就讲了，不要搞武斗，这是阶级敌人搞的，你硬要搞，就要犯错误，坐监牢。

昨天大会上点了邓长春、方文正的名，总的反映好，人心大快，大快人心，这个气氛好，互相攻击的只发现这两条标语。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阶级敌人要作垂死挣扎的。昨天西师两个地方发生了武斗，我们对这个武斗采取了断然措施，必须抓打人凶手，交出幕后策划者，哪里再搞武斗，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最近，有人说：“我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奋斗了两年，最后逍遥派进入了革委会，好像我们造反派错了。”如把没参加两派组织的群众排斥在外，是不对的，不要戴帽子，什么逍遥派，不关心政治，不突出政治，不关心文化大革命。人家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反对武斗，你就没有理由把人家排斥在外。优秀的革命造反派应当吸收进来。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听毛主席的话，造走资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这是主流、本质，但也犯了一些错误，那我们不能因一些错误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些都是个别的，我们批了很多革委会，里面很多都是你们讲的“老造反”。

最近两军换防，敌人也在活动，个别头头派性发作，希望不要上阶级敌人当，不要搞小动作，个别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派性发作，浑身膨胀，有人说“顶住就是胜利”，你顶什么？顶大联合，三结合，顶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的说“拖住就是胜利”，你拖什么？拖大联合、三结合，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人说“现在形势，跑它六个月就过去了”。我说：你跑三十年也跑不掉，跑不了。去年梁司令员讲了：“你跑到天上，我们有高射炮、导弹，你跑到外国，就是叛国。”于克书不是跑了一年，现在也抓住了。×××（未听清）跑了，这次听说两军换防，他以为解放军走了，就出来，也被我们抓住了。去年八·二二宽银幕事件是他搞的，打死打伤我们的张处长、郝处长、曾处长等，但他后面还有人，我们主要打击的就是他幕后的策划者。对他们就是抗拒从严。

最后希望同志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搞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建党作好准备工作。这样才能立新功、建新劳。